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馬克思·列寧·斯大林

論民族革命問題



火炬出版社



論民族革命問題

馬克思 列寧 斯大林

火炬出版社

1938

論民族革命問題



——實價每冊國幣三角——

著作者：馬克思·列寧·斯大林

編譯者：李鐵冰

出版者：火炬出版社

發行者：火炬出版社

經售者：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

▲初版一——五〇〇〇冊▼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二日出版

李震雲章

編譯者前記

民族革命問題是世界革命中最大的問題之一，特別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這個問題必須拿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觀點來分析，然後才能得到正確的解決。現在中國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正在空前的英勇的進行着；凡是爲中華民族解放而鬥爭的人們，確有研究馬克思，列寧，史大林等關於民族革命問題的重要論文之必要。

讀者看完了這小集子，對於決定民族革命戰爭的戰術與戰略，將有不少理論上的幫助。

一九三八年三月五日李鐵冰，漢口。

馬克思·列寧·史大林論民族革命問題目次

中國及歐洲的革命	馬克思
工人階級與民族問題	列寧
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	列寧
第三國際第二次大會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決議案	列寧
在第二次共產國際大會上的演說	列寧
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附加議案	羅易
十月革命與民族問題	史大林
民族問題	史大林
論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	史大林
再論民族問題	史大林
東方大學的政治任務	史大林
問題的提法	史大林
民族自主	史大林

中國及歐洲的革命

馬克思

一個探求支配人類運動原理的深玄的想像家，慣於把兩端相接的法則，稱爲支配自然界奧秘的原則。在他看來，俗諺「兩極相遇」者，在人生的每一方面，都是一個偉大而有力的真理。這一個原理，哲學家用之，可以執簡馭繁，如同天文家用克普勒爾的法則或牛頓的偉大的發現（引力的法則）一樣。

兩極相遇，是否那樣一個普遍的原則？姑勿深論；而此原則之顯明的表現，是在中國革命似將影響到所謂文明世界的結果看得出來的。說歐洲人民的未來暴動，和他們的爲共和的自由與政府的經濟的未來運動，其係於現所經歷於此天朝帝國者將遠勝於現存的任何其他政治原因，抑且勝於俄羅斯的威脅，以及從而發生的全歐戰爭之似有可能，這似乎是奇而妄的推論；但此並不謬妄，只一細察此事的實狀，便可洞明無餘了。

不管什麼是他的社會的原因，不管他們聽的是什麼宗教的朝代的民族的形式，他產生了慢性的變亂，過去約十年間存在於中國，現在集合起來，成了一個可驚的革命。他的暴發的機會，毫無問題的是那強制輸入麻醉毒品叫做鴉片的東西於中國的英國大砲所給與的

。在英國炮火之前，滿洲皇統的權威，掃地無靈了；天朝永世的迷信，全然打破了；封鎖未開與所謂文明世界未曾接觸的孤立，驟被侵入了；東西交通的開發，從此以後，在加利佛尼亞洲及澳洲的黃金的誘引之下，很快的進行。同時這個帝國的銀錢——他的生命膏血——開始流出到大英帝國的東印度了。

一八三〇年以前，中外貿易的平衡，還是中國方面站在有利的地位。銀貨不斷的由印度不列顛北美合衆國輸入於中國。一八三三年以後，特別是一八四〇年以後，則銀貨由中國到印度的輸出，幾乎耗竭了這個天朝上國。於是中國皇帝嚴令禁止鴉片貿易，但是它所得到的還答，是對於他的法度與以更強的抵抗。除去直接的經濟結果以外，關聯到鴉片秘密運輸的賄賂出行，將中國南方各省國家官吏的風紀完全爲其腐化。如同把皇帝看作全國的父親一樣，皇帝的官吏，亦被看作是對於各該屬縣邑的維持親長關係者。但此維繫國家全局唯一的父權的威力，和道德紀綱，逐漸爲以默許鴉片秘輸自飽私囊的官吏的腐敗所蝕毀了。此種情形，曾多見於發生變亂的南方各省，鴉片遂適如其分以獲得了制馭中國的主權，而皇帝及其官派十足的臣僕，乃已喪失其所自有的主權了。這好像歷史在它把中國全民族從其遺傳的愚昧中拯救出來以前，先使他們沈醉一回似的。

英國棉花的輸入，從前幾乎沒有，英國羊毛的輸入，亦只有少許。至一八三三年以後，則二者輸入於中國，很快的增加，這是由東印度公司把對華貿易獨佔轉移到私人商業的

時期。至於此時物品大規模的輸入中國，乃在一八四〇年以後，這是其他各國，特別是我們自己的國家（北美合衆國）在中國貿易亦獲得一份的時期。

這個外國製造品的引入，影響到本地的產業，同他從前影響到小亞細亞，波斯，印度一樣。在外國競爭之下，中國國內有許多紡織者，都遭受了很大的艱苦，而社會生活，亦隨着外貨侵入的程度，呈現出不安的景象。

一八四〇年不幸的戰爭以後，賠款必須付給英國。那巨額的不生產的消費的鴉片，隨着鴉片貿易而產生的貴重金屬的流出，外國競爭對於本地製造品的破壞的影響，公共行政的腐敗情形，產了兩件事情：舊稅益加繁累，新稅又見增設。這樣，在一個一八五三年一月五日由北京發出的皇帝詔令裏，我們可以察知有些命令頒佈給武昌，漢陽等處以及南方各省督撫，令他們減輕或延緩人民的納稅，特別是無論如何不許強取以逾定額。詔令上說：倘不這樣，則「貧苦人民將何以堪？」詔令上又說：「則當舉國艱憂之時，如此吾民或能免於苛吏誅求之禍矣」云云。這樣的辭句和這樣的寬假，我們猶憶在一八四八年間曾從奧地利亞聽見過，那是日爾曼的中國。

所有這些集合起來，從着中國的財政道德產業及政治構造而行動的崩潰的原因，在一八四〇年英國炮火之下，接受了完全的發展。這個砲火，打落了清朝皇帝的威靈，強迫了這天朝上國與俗野的世界相接觸。完全的孤立，是老大中國保藏的原狀，那個孤立，必須

依賴英國的煤介來一個強制的終結。分解必定隨之而起，這與謹藏在封固的棺中的木乃伊，不論何時，一與空氣相接，立即分解，一樣是確然的。現在呢，英國已經造成了中國的革命，問題是那中國的革命怎樣的遲早將其反響及於英國，經由英國以及於歐洲，這問題是不難解決的。

一八五〇年以後，讀者常被喚起，使其注意及於英國製造品不平衡的發展。在那最可驚的繁榮中間，不難指出一個逼近產業危機的顯明徵候。雖然有加里佛尼亞洲和澳洲，雖然有浩大前所未聞的移民出境，苟無任何特別事變，在一個相當時期，遲早總有一天，市場的擴張，不能齊驅並駕於英國製造品的擴張。這種不相齊比，必要造成一個新危機，其確定與過去所曾經歷者全無異致。但是假如大市場中之一忽然變成縮狹，那麼危機之到來，亦必因之而加速。目下中國的變亂，完全有此影響及於英國。開闢新市場或擴大舊市場的必要，是英國茶稅低減的主要原因之一，期於以茶的增加的輸入，謀對華製造品的增加的輸出。現在每年由聯合國輸出到中國的價值，在一八三四年東印度公司所享有的貿易獨佔權廢止以前，總額只爲六〇〇，〇〇〇磅；在一八三六年，總額達於一，三二六，三八八磅之數；在一八五四年（此年代疑有誤）又增加到二，三九四，八二七磅；至一八五二年，則達於約三，〇〇〇，〇〇〇磅了。至於由中國輸入英國的茶的總量，在一七九三年，尙未超過一六，一六七，三三一兩；但在一八四五年，達於五〇，七一四，六五七兩；

在一八四六年，則又達於五七，五八四，五六一兩；現在（一八五——一八六二）已超過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兩以上了。

上季茶的收穫，超過了前年的產額，不下二，〇〇〇，〇〇〇兩，已經爲上海的輸出明白表示出來了。這個超過，有兩個情由可以說明：一方是一八五一年終的市場情形很是低減，多量剩餘下來的過剩物品，移入於一八五二年的輸出；在另一方，是那關於茶輸入的變更的英國立法的近頃報告，傳到了中國，使所有有利的茶，都以極貴價錢，上了預備市場。但是關於來季的收穫，則情形大異了。這可以從倫敦大茶莊的通訊中，摘錄下來的下列語句證明：

「在上海，恐慌已達於極點。金價漲了百分之二十五，銀的缺乏至於一點亦不能不見得以還付英船對於中國應付的稅款，這於出港許可，乃是必須的。因此阿爾柯克君曾同意於負有對中國官吏交還這些稅款的責任，而以東印度公司的票據，或其他認可的担保的領取證爲質。設若着眼於商業的最近的將來，則金屬的缺乏，乃爲最不利的景象之一。因爲此種空虛，適值於他們的使用是最需要的時會，以致茶絲的購買者深入內地影響於他們的購買，爲此等購買，須以正在騰漲的金銀塊付價，以致那些生產茶絲者得以盡操縱的能事。

一歷年此季，開始採辦新茶以爲常。可是在現時除去保障人身與財產的方法而外，什

麼也談不到。一切交易，都已截止。……設若在四五月中不能應用那些保護茶葉的方法，這黑茶綠茶一切純良種類的均包含在內的早期收穫，將成爲同在復活節尚未成熟的小麥一樣的損耗。」

現在保護茶葉的方法，一定不是英，美，法等國的艦隊駐在中國海中可以給與的。可是因爲他們的干涉，這些却很容易產生像那可以切斷產茶內地與輸茶海港間一切交易的糾紛情形。如此則於現在的收穫，一個價格的騰起，是可以預期的（投機已經在倫敦開始了）。即如次季的收穫一個大的缺乏，亦是同樣的確定。不寧惟是，中國人亦同在革命的震動時期中的一切民族一樣，雖然準備着將他們手下的那一切笨重的物品賣與外國人，而如東洋人在大變動的恐怖中所慣作的事情一樣，亦欲置之於貯藏。故於茶絲取債，除硬貨的錢幣外，則多不願接受，英國於是乎可以預期他的主要消費品中之一的價格的騰起，金銀塊的流出，出售他的棉花和羊毛製造品的一個重要市場的縮狹，即那一切威脅商業社會沉靜精神的事物的樂天祝呢家的「經濟學派」，亦不能不作如下的語句了：

「我們不要自信覺得一個爲我們輸出品去到中國的市場，其廣大一如從前。……我們對於中國的輸出貿易，將要遭蒙損害，曼却斯特和格拉斯哥的生產，將有一個減少的要求，這是最可能的。」

切莫忘記了像茶那樣一種必需的物品，像中國那樣一個廣大市場的縮狹，將適合於西

歐整個的歉收，從而發生麥穀和其他農產品價格的騰貴，於是縮狹了製造品市場。因爲每一種首要的生活必需品價格的騰漲，依賴一個相當的對於製造品的需要的減低，相爲抵消，以保內外的平衡。邇來大不列顛各處，時聞關於收穫減色的嘆聲，「經濟學派」關於此問題有云：

「在英倫南方，不僅有些土地尙未耕種，並有許多已種的田，亦呈出惡象，或則穀實的發育不良。預定種小黍的濡濕下田，正在發生損害的徵候，已極明顯，種體菜 *Mangel* *Wurzel* 的時期，現在可以說是已經空誤了種植的很少。而那預備種蕪菁 *Turnip* 的田地，看看亦迅將過去，爲這樣一種重要的收穫的任何充分的預備，亦沒有安置妥當。……燕麥的耕種，被雨雪妨害了不小。及時下種的燕麥很少，遲種的燕麥，少有能得豐厚的收穫的。……在許多區域內，飼養的羊羣間的損失，其價值亦不在少。」

穀以外的農產品價格，比去年的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甚至有百分之五十者。在歐洲大陸，穀較在倫敦騰高，而在比利時及荷蘭，則菜麥高漲了一倍，小麥及其他種穀物，亦從其例。

在這種情形之下，因爲普通商業的大部分，已爲英國的商業所蕩盡。我們可以很穩當的卜知中國革命將擲其火星於現在的產業制度積載過多的地震上，而致此長期準備的總危機的爆發。這個廣播海外的總危機，將爲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所緊接。中國送來騷亂於兩

方世界，而兩方列強方由英，法，美的戰艦載着所謂「秩序」到上海與南京。這是一個偉壯的奇觀。這些將要援助那動搖的滿洲皇統的秩序販客的列強，忘記了對於外人的憎惡並驅逐外人出此帝國，從前只是中國的地理的人種的位置的單純結果，而白滿洲韃虜征服此邦以後，纔成爲政治制度了麼？在十七世紀末，那互相競敵，爭與中國通商的歐洲各國間的紛爭軋轢，給了滿洲所採行的排外政策一個大的助力，乃足明顯無疑的事實。此外這個新朝因恐外人或將左袒那當中國人民被征服於韃虜的上半世紀間在大多數華人間存在的不平，而益促其採行排外政策，也更加劇。根於這些顧慮，當時外人遂被禁止而不許與華人交通。外人只准經由一個離北京及產茶地方甚遠的都市，廣州與華人通商。而外人的通商，又只限於與行商交際。行商是政府特許公開的從事外國貿易的商人，爲的是使其餘的人民得以避免與那可憎的遠人相接觸。無論如何，西方各國政府對於中國的干涉，此時足能使中國革命愈益猛烈，愈益延長商業的停滯而已。

同時關於印度有須注意的，是那個世紀的英國政府，足有他的歲入七分之一，是靠售賣鴉片於華人的。同時印度人的大部份，又靠着在印度鴉片的出產，以需求英國的製造品。華人對於鴉片的使用的非難，並不減於德國人的禁絕烟草。但是因爲這位新皇帝知道贊成鴉片的培植及在中國自己境內鴉片的預備，很明顯的將立刻予印度的培植鴉片事業，印度的歲入以及印度斯坦的財源，以絕大的打擊。此種打擊，雖不能立刻即爲與此有關的利

害關係所感覺，經過一個相當的時期，將必顯其效用，將必加厚並且延長這普遍的財政危機。這危機是我們已在上文卜定其運命的。

自從十八世紀開始以後，在歐洲未曾有過激烈的革命而不先聯以商業和財政的危機的。此理證之於一七八九年的革命與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悉無二致。這是實在的，不僅僅我們每天看見那些統治的權力者與其人民間，國家與社會，各階級間，衝突的徵候，一天一天的加多；便是現存的各強國間的衝突，亦似乎將要達到圖穹穹見的程度，最後談判的機運，亦且若隱若現了。在歐洲各國的都市，每日都有關於普遍大戰的飛書相告，一到次日，此等消息，又復消滅了，似乎又有個半世期的平和的確保了。雖然，我們的確知道，歐洲列強間的衝突，可以達到無論如何的極度，外交界的情形，可以顯出無論如何的危迫，由於這個國那個國的些許狂熱的黨派，無論如何的運動都可以企圖；可是那些王公的忿怒，人民的憤慨，都一樣的被那繁榮的呼吸消沉下去。戰爭與革命，都一樣的不能令歐洲爭鬩起來，除非是一個普遍的商業的和產業的危機之結果。這個危機的信號，與風常一樣，必要發自英國，他是世界市場中歐洲產業的代表。

注意政治的關係是不必須的。就以英國工廠有前所未聞的擴張，英國的公同政黨全然瓦解，法國的全部國家機關變成了廣大的詐騙投機買賣的商館，奧地利的財政瀕於破產，招人民仇恨的錯誤，層層疊疊，到處都是，反動的列強間的利益衝突，和那曾經一度顯

露於世的征服世界的俄羅斯迷夢等等事實看來，在這些時候，那樣一個危險必定產生。

工人階級與民族問題

列寧

俄國是民族最多的一個國家，政府的政策地主的政策依賴資產階級以貫徹到底的是一個反動的民族主義政策。

這個政策的趨向，是反對俄國內部的多數民族，即是全國人口之多數；同時滋萌了其他民族，即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就是波蘭，猶太，烏克蘭，格魯齊亞等。）他們的目的，是要努力使工人階級參加於民族運動或是民族文化運動，但是不要他實行世界上最重要最偉大的任務。

民族問題是要確定的解釋，一切有覺悟的工人都應認識清楚。

資產階級與人民和勞動者共同爲爭自由而奮鬥時，主張各民族得有完全自主與平等權；在德謨克拉西制度下先進的國家如瑞士，比利時，瑞威等是個最好的民族和平共居或民族自由分立之先例。但是現在資產階級畏懼工人故與保皇黨一類的潑列許開維斯基聯合與反動勢力聯合，遠反德謨克拉西主義，提倡壓迫民族，主張民族不平等，并且用民族主義的口號來誘惑工人。

如今祇有無產階級提倡各民族真正的自由和民族工人的一致。

爲要各民族自由和平的共居或是彼此分立組織自己的國家，則必須實行工人階級所提倡的完全的德謨克拉西主義，無論任何民族不許有些微的特權，各民族語言亦不得有特權，對於少數民族不許有絲毫的壓迫和不公道，這就是工人德謨克拉西的原則。

資本家及地主非要將各民族工人相互隔離不可。但是現在世界上各國之最高當局者，均作不可言的融洽在一起彷彿如一個偉大「公司的股東」一般，（如同西伯利亞，林納金鑛公司一般）所以正教的，回回教的，猶太人，俄國人，德國人，波蘭人，烏克蘭人，凡是有資本的人不分民族的共同來壓迫各民族的工人。

有覺悟的工人主張各民族工人在無論是教育職工政治等一切工人團體中得有完全一致之必要，讓民族立憲黨的老爺們去否認或消滅烏克蘭民族的平等吧！這是於他最可恥的！讓各民族資產階級提倡虛偽的「民族文化」民族運動的任務等等口頭禪以自己慰自己吧！無論民族文化或民族文化獨立的言詞如何甜蜜，工人絕不會自己分離，各民族工人和睦的在他們共同團體之下，堅持保護他們完全的自由與平等，這就是真正文化進步的一個保證。

工人在世界創造他們自己的國際文化，此種文化早已有壓迫制度的仇敵和提倡自由的宣傳者種下根苗了，舊的世界就是壓迫民族的世界，民族互相爭奪或民族隔閡的世界，與

舊世界相反的，是工人創造的各民族勞動的一統的新世界，在這新世界裏絕無特權之餘地，亦毫無人壓迫人的現象。

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

列寧

第一、帝國主義，社會主義，及被壓迫民族的解放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的階段，在先進國家資本已經超越了民族國家的界限，以「壟斷」代替了「競爭」，因此創造了實行社會主義一切客觀的前提，所以目下在西歐和美國循次發生着無產階級革命的鬥爭，以推翻資本主義的政府，而奪取資產階級的財產，這是帝國主義推動羣衆實行的；此種鬥爭，因為他將階級的矛盾更爲擴大和嚴重，人民在經濟方面的狀況，因信託公司物價昂貴，日漸墮落；在政治方面，亦同樣因軍國主義的伸張，時常發生戰爭，反動力的強勝使民族壓迫和殖民地的掠奪隨着堅固和擴張，勝利的社會主義必須實行完全的德謨克納西，因此，不但實行各民族完全的平等並須實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自決權；換句話說：就是政治上的民族自決權。一切社會主義的政黨在現在時期和革命時期革命勝利後時期，若是實際的行動不能證明在實際上是要解放民族並與被迫壓民族樹植自由聯盟的關係，則此等社會主義政黨對於社會主義完全是背叛的行動，因

爲沒有民族自決權，則自由聯盟便是一句騙人的話。

然而德謨克納西亦是一種國家的形式，等到國家要消滅時，它亦隨着消滅，但是在最後勝利的和穩固的社會主義過渡到完全的共產主義時才能達到。

第二、社會主義是爲德謨克納西的爭鬥

社會主義革命不僅是一種行動，不僅是在一個戰線上的死戰，而是猛烈的階級衝突在整個時期中在一切戰線上之長期的死戰，這就是關於政治和經濟問題的死戰，這些死戰只有奪取資產階級的財產才能完成。若以爲德謨克納西的爭鬥，會使無產階級脫離社會主義的革命，或是阻礙和掩蔽了社會主義革命，諸如此類，那就是一個根本的錯誤；反之，若不實行完全的德謨克納西，社會主義的勝利，便是不可能的，同樣無產階級若不普遍的陸續的做德謨克納西的革命爭鬥，便不能準備戰勝資產階級。

若從德謨克納西政綱抽出一條如關於民族自決權，說是這一條在帝國主義制度之下，恐怕不能實行，或是一個夢想，這個錯誤，亦不亞於以上的一個錯誤。若說是民族自決權在資本主義範圍內不能實行，此種論點有兩個說法；或是他有一個絕對的意義——經濟方面的意義；或是一個相對的意義——政治方面的意義。

說到絕對的意義，在理論上他是一個根本的錯誤，因爲一，若以爲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如工人儲金和消滅經濟恐慌等不能實現，便說民族自決權亦不能實現，這是完全不正

確的；二，舉例說，如一九〇五年腦威脫離瑞典之事實亦不能駁倒不能實行民族自決權的論者；三，假使德意志，英吉利不拘今天或明天稍行變更他們的政治上與戰略上相互上之關係，則波蘭，印度等等，即能立刻實現新國家的組織，若是有人來否認他，這是極可笑的；四，財政資本擴充的趨勢，極容易收買或賄賂那些最自由的德謨克納西的共和政府，及獨立國之被選舉的官吏，財政資本的統治，和普通資本是一樣的，在德謨克納西政治範圍內，無論怎樣改革，亦不能驅除他。他對於德謨克納西政治的關係，完全是獨立的，例外的，財政資本的統治，絲毫不能消滅德謨克納西的政治意義。蓋德謨克納西政治，乃是更自由的廣大的和明顯的階級壓迫和階級鬥爭的方式。所以那些在經濟意義上的論斷，以為資本主義制度之下不能實行德謨克納西政治的要求，這是理論上不正確的定義。

就是對於資本主義與一般德謨克納西政治之普遍的根本的關係理論錯誤的定義。

說到相對的意義，這個論點亦不完滿，更不正確，因為在帝國主義制度之下，不僅是民族自決權，只能不完全的殘缺的實行，（例如一九〇五年腦威脫離瑞典）而一切政治德謨克納西亦然。一切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所提倡之即刻解放殖民地的要求，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除了革命之外，更不能實現。然而社會民主黨並不能因此而拒絕這些要求，並放棄這些鬥爭。這種行動，只利於資產階級與反動勢力，社會民主黨應該以革命的手段去實行這些要求，不應以改良的方法。不要被資產階級的合法範圍所限制，而是要破壞他；不

要以出席國會提出抗議爲了事，而是要吸引羣衆做積極的行動；擴大並煽動這個根本的德謨克納西要求的鬥爭一直到無產階級直接攻擊資產階級。換句話說，直到社會主義革命奪取資產階級的財產爲止。社會主義革命之能引起，不僅是由於發生偉大的罷工或示威運動，或飢餓的叛變，或兵變，或殖民地暴動，即任何政治上的危機，如「特萊甫斯訟案」，（該案發生於法國，特萊甫斯爲法國軍官，有誣告他爲賣國賊的。該案表示法國軍界和宗教界反對猶太的動機）或「蔡俾爾事件」（該案發生於愛爾塞斯城，有二德國軍官摧殘市民。）或是有關於被壓迫民族獨立，國民自決權等問題亦能引起之。

在帝國主義之下，因民族壓迫的加厲，社會民主黨不但不放棄民族獨立自由的鬥爭，（如資產階級指爲烏托邦的）他反而要加緊利用在這上面所發生的衝突，因爲這是羣衆行動的發端，是反對資產階級革命的發端。

第三、民族自決權的意義與聯邦制度的關係。

民族自決權只是表示政治上的獨立，就是在政治上，得隨意脫離壓迫民族之自由權。具體的說來，此種政治的德謨克納西的要求，是爭取獨立的自由宣傳，用民族自決權的方法解決民族獨立問題。因此，此種要求，並不是將一個大國分成爲許多複雜的小國，他只是順次表示反對各種民族壓迫的鬥爭；若是某一國家的制度，愈是接近德謨克納西制度，而不妨害於獨立，則在事實上愈能少發生獨立的趨向，因爲就經濟進步而言，根據人民羣

衆的利益而論，凡是整個的一個大國比較多有利益，而資本主義愈發達，則利益亦愈伸張。承認民族自決權，並不是等於承認聯邦主義，或許是絕對的反對聯邦主義，而同時却贊成德謨克納西的集中主義。不過與其民族不平等，則不如聯邦之爲愈，因爲聯邦主義「是達到完全德謨克納西的集中主義」的唯一道路，馬克思雖然是提倡集中主義者，亦寧願愛爾蘭與英國有聯邦制度，而較英國壓迫屈服愛爾蘭之爲愈。

社會主義之目的，不但是要取消人類小國的分立，以及各民族的隔閡，並且是要民族的接近和民族的同化。爲要達到這一個目的，故應在一方面向羣衆解釋倫納爾，鮑威爾所提倡之「民族文化獨立」的反動思想，另一方面得要求在實際上解放被壓迫民族，萬不許只說空話和空虛的宣言，或是將這問題遷延到社會主義時代，反之是要極明顯極確實的訂定一個政治綱領。

特別的指出那些壓迫民族社會黨的野心和畏怯。人類只有經過被壓迫階級專政的過渡時代方能消滅階級的區別，同樣人類不能避免的民族同化，只有經過一切被壓迫民族完全解放之過渡時代——就其被壓迫民族能獨立自由的時代方能達到。

第四、民族自決權根據無產階級革命的解釋

不只是民族自決權一條的要求，所以我們德謨克納西黨綱的要點，最初在十七八世紀就已經被小資產階級提倡了，小資產階級至今仍然提倡烏托邦的綱領，看不見階級鬥爭，

更感覺不到階級鬥爭在德謨克納西制度下的猛烈，他始終相信有和平的資本主義；這種平等民族之和平聯盟的烏托邦，極爲考茨基一般人所主張，藉以欺騙人民，社會民主黨的綱領，其主張應與那些庸俗的機主會義之烏托邦完全相反，因爲民族之分爲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是帝國主義時代根據的屬性，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不能像那些講和平的資產階級用些一般的抽象的口吻，去反對侵略主義和贊成普遍的民族平等，無產階級對於某一國之境界，不能漠然視之，因境界問題建築在壓迫民族之上，境界問題，對於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是極不痛快的。無產階級不能不反對，若是要強迫的把被壓迫民族放在某國境內。這就是表示無產階級爲民族自決權而奮鬥，無產階級應當要求各殖民地和被壓迫民族在政治上得自由分立，否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只成爲虛話。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工人之間，即不能發生彼此的信任和階級的同情。而改良派和考茨基派對於民族自決權僞善的面孔，及其對被壓迫民族和強迫其他民族爲其國家之私有物的隱蔽手段，始終是不能使之暴露。

另一方面，壓迫民族的社會主義者應特別提倡和實行完全的建立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工人的統一，即不能執行無產階級獨立的政策，及與其他國無產階級的同情。因爲資產階級同時做各種誑騙的，詭詐的，和相反的行爲，而被壓迫民族資產民族時常將民族解放的口號，作爲欺騙工人階級的口號；在對內政策上則利用此口號與統治民族的資產階級妥

協，（如在奧國和俄國之波蘭僑民與反動勢力妥協去壓迫猶太人，烏克蘭人。）在對外政策上，資產階級則企圖與帝國主義相互競爭中的某一強國訂立協定，藉以達到實行掠奪的目的，（如巴爾幹半島各小國的政策，諸如此類）。社會民主黨不能因為民族解放的鬥爭，在反對某一帝國主義國家時，在各種情形下會被其他強國乘機利用，以遂其帝國主義之目的，就因此而拒絕承認民族自決權。同樣社會民主黨亦不能因為資產階級屢次利用共和主義的口號，做政治的欺騙和財政的掠奪，而放棄共和主義。

【註】若說民族自決權會引起「保護祖國」主義，如社會愛國派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常把各種德謨克納西的要求（如德謨克納西的共和主義）和各種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方式作為「保護祖國」的印證，因此之故，否認民族自決權。這不待言，是極可笑的。馬克思主義承認「保護祖國」，如在法蘭西大革命，歐洲加里西班牙戰爭時；同樣否認「保護祖國」，如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帝國主義戰爭時。馬克思主義是根據各個戰爭具體的歷史的特性來分析，並不根據某種普通的原則，更不是根據黨綱的某一條。

第五·馬克思主義和蒲魯東主義關於民族問題

馬克思針對着一切小資產階級德謨克納西主義者說：一般的德謨克納西的要求，並不是絕對的而是資產階級領導人民羣衆反對封建制度之歷史的表現，這些要求在或種環境之下，無一不是為資產階級欺騙工人的工具，所以若從德謨克納西政治的要求而將他去反對

其餘的，如此在理論上是根本的錯誤。而在實際上無產階級爲要保護他自己的獨立，爲要進行推翻資產階級的革命鬥爭，只有爲一切德謨克納西共和國的要求而屈服自己的鬥爭。

另一方面，馬克思針對着以社會主義革命的名義否認民族問題的蒲魯東派說：先進國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是一切事件的前提，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根本的原則，就是：壓迫其他民族的，不能稱爲自由民族，在一八四八年馬克思根據德國工人運動的利益，要求德國勝利的德謨克納西宣告和實行被德國所壓迫的民族的自由，在一八六九年馬克思爲英國工人的革命鬥爭起見，要求愛爾蘭脫離英國，並且附加一句話，祇要愛爾蘭能獨立，更無論他將來是否成爲聯邦。馬克思祇因爲如此的要求，方能正確的教訓英國工人得到國際主義的精神，祇有這樣，才能以革命的方法解決現時歷史的任務，幷反對那些機會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已經過了五十年，一直到現在，對於愛爾蘭問題，還絲毫沒有改革。馬克思祇有照這樣的辦法，方能駁倒資產階級的謬論，因爲他們認爲民族自決權是烏託邦，認爲一切經濟政治的集中，都是進步的現象，馬克思只有這樣才能貫徹他的主張非帝國主義形式的集中，民族的結合不根據於強迫，而根據於各國無產階級的同盟。馬克思祇有這樣解決民族問題，才能領導羣衆的革命行動，反對那些空談家及虛偽的承認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決權者。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戰爭暴露了機會主義黨和玖茨基派的野心及其偽善面孔；證明了馬克思政策的正確。馬克思政策將

來必成爲壓迫其他民族的先進國之模範。

【註一】 有許多人根據馬克思對於某種人民的民族運動，有消極的態度，（如在一八四八年，對於捷克民族運動是）就想依據馬克思的觀點來否認民族自決權之必要；如最近有一德國黨員倫起——在 *Die Glocke*，雜誌第八號和第九號有這樣的文字——但是這個不對。因爲在一八四八年，歷史與政治上的原因，已將各民族反成爲反動勢力的，與革命的德謨克拉西的。馬克思懲罰第一種民族，保護第二種民族，是很合理的。民族自決權，乃是德謨克拉西的要求中之一，自然，應將此種要求完全隸屬於普遍的德謨克拉西的利益，在一八四八年，和繼續的數年中，此種普通的利益，第一聲便是與『沙的主義』的爭鬥。

【註二】 倫起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內一個有聲譽的黨員，他與密林克充當萊佛次克國民日報的主筆，是一個經濟學家和批評家。自帝國主義戰爭爆發後，他與右派脫離關係，而變成愛國社會主義的首領。

Die Glocke 雜誌是鐘聲之意，這是派仍威思最激烈的一個愛國社會主義黨員和德國帝國主義的直接代辦人所開辦。

第六·對於民族自決權三種形式的國家，關於此項問題，必須分析三種主要形式的國家。

一：是西歐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和美利堅。在此種國家中，資產階級激進的民族運動早告段落，這些『強勝』民族，都是壓迫殖民地或是國內異已民族的，在這些統治民族中無產階級的任務，如同十九世紀在英國對愛爾蘭的關係一樣。

【註】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有些小國家參加戰團如荷蘭瑞典，他們的資產階級竭力利用民族自決權的口號以辯護參加戰爭，因此，在這些國家的社會民主黨，也根據這個例證，作為否認民族自決權的理由，將無產階級正確的策略，——就是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否認『保護祖國』的政策，他們以一個不正確的原理來作護符，因此在此理論上改變了馬克思主義，在實際上是一種膚淺的短視的民族主義，因為他們忘却了有數萬萬人口的民族被強權民族所壓迫。——郭爾泰著了一冊很好的書，題為『帝國主義戰爭與社會民主黨』，雖然他否認民族自決權的原則是不正確，但是他利用這個原則，却頗為愜當，就是他說：『荷屬印度必須立刻有政治的與民族的獨立』，而暴露了那些不敢提倡此種要求的荷蘭機會主義黨。

二：是東歐各國如澳洲和巴爾幹半島的小國以至於俄國。在二十世紀，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民族運動特別發達，而民族的鬥爭亦極猛烈，這些國家內無產階級的任務，非提倡和堅持民族自決權，則不能達到他們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改造，和扶助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在這當中最困難的而最重要的任務，是壓迫民族工人與被壓

迫民族工人實行階級鬥爭的同化。

三：是半殖民地國家如波斯土耳其和一切殖民地共有十萬萬的人口。在這些地方，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運動有一部分在開始，有一部分尙未成功，社會主義者不但應當要求無條件的無報酬的立刻解放殖民地，這種要求在政治上就是表示承認民族自決權；並且還應當最堅決的維持這些國家中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最革命分子，幫助他們以暴動，或乘機做革命的鬥爭，以反對壓迫他們的那些帝國主義國家。

第七·社會愛國主義與民族自決權

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戰爭時代，在先進國發生一個特殊的任務，就是反對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在社會愛國主義者之中，對於民族自決權問題，有兩大派別：一是機會主義派；一是考茨基派。考茨基派對於反動的帝國主義戰爭的意義用『保護祖國』的觀念，掩蔽起來。

一方面我們能看出資產階級的極忠順的僕役，替他們竭力擁護侵略主義，說帝國主義和政治上的集中，均是積進的現象，而否認民族自決權，說是一個夢想的小資產階級的烏託邦，在這方面的主要人物是古諾夫，派耳武思，和德國的激烈機會主義者，并法波揚黨的一部分，和英國工團首領之一部分和俄國機會主義者綏姆柯夫斯基，李布猛，郁爾開維等等。

另一方面我們能看出考茨基派——他們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汪脫爾文特，萊諾脫爾，及其他許多法國英國的機會主義者，他們主張聯合那一方面，而實際上完全與他們相同，因為他們講民族自決權，純粹是口頭上的，虛偽的，他們以為政治獨立自決的要求太過度，（見一九一五年五月十六日新時代雜誌）他們不主張壓迫民族社會主義者必須有革命的戰略，而圖謀遮掩他們應盡的革命責任，辯護機會主義的主張，以幫助他們誑騙人民，不願意講國家的界綫問題，和強迫不平等的民族隸屬於自己國家之內等等。

這一派與那一派，均是同等的機會主義派，他們拿馬克思主義當做賣淫的東西，對於馬克思所講的政策理論的價值和實際的必要，即以愛爾蘭問題舉例來說，他們實完全喪失了知覺的本能。一點也不能了解。

至於侵略主義局部的問題，他只有在戰爭關係中，才特別重要，但是什麼是侵略主義？這極容易證明的。那些反對侵略主義的，或是用承認民族自決權的方法，或是以和平主義為根據藉以保護領土，仇視一切，甚至以強力壓迫革命者，這都是在根本上與馬克思主義是不能調和的，是奸詐的。

【註】古諾夫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最著名的學者和批評家，他是考茨基所辦的社會民主黨的雜誌『新時代』的投稿者。

法波揚自一八八三——八四年在英國成立資產智識階級的同盟會，他主張一切社

會上政治的變更，應用伯拉圖的和平宣傳社會主義的思想以冀達到目的，此種主張爲最激烈的機會主義始終所服膺。

汪脫爾文特爲第二國際的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主席，是激烈的愛國社會主義者之一，在大戰時參加於比利時的內閣（資產階級和教主的內閣）充任總長。

萊諾脫爾是法國社會主義黨的右派領袖，是最激烈的愛國社會主義者，自柔勒死後（法國社會主義黨首領）充當中央委員會機關報『人道報』的主筆，以後該報歸共產黨管理。

第八．在最近的將來無產階級具體的任務

社會主義的革命，在最近的將來，可以開始，那時無產階級的任務，是須立刻保護政權，奪取銀行，及實行其他種種迪克推多的辦法，那時候資產階級，尤其是法波揚和考茨基的智識階級，是必須力議解散和窒礙革命的發展，給他們一些狹隘的德謨克拉西的目的，無產者攻擊資產階級政權的基礎時，那些純粹的德謨克拉西要求，能够成爲一種革命的障礙物，不過祇有一種要求，是必須提倡和實行，就是解放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要求（換句話說，民族自決權。）這種要求不但是在社會主義革命之下是唯一的必要，而在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革命的勝利時亦爲同樣的必要，譬如在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時，或是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時。

但是也許尚須經過五十年，或是尙不止此，方能發生社會主義革命，那麼首先必須給與羣衆以革命的教育，使工人政黨不得有愛國社會主義派及機會主義派發生，而使他們得着勝利，如同他們在一九一四——一六年間得着勝利一樣，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應向羣衆宣傳英國社會主義者之不要殖地地和愛爾蘭的獨立，德國社會主義者之不要愛耳塞司，丹麥，波蘭等等民族的獨立，不直接煽動羣衆以革命的行動來反對民族的壓迫，不利用如蔡俾爾事件，（參看上註）在無產階級中作最廣大的秘密的宣傳，使他們舉行示威運動和革命的羣衆暴動，俄國社會主義者之不要芬蘭，波蘭，烏克蘭的獨立自由，這一類的愛國社會主義者祇是血腥浸染的帝國主義君主國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僕役。

第九·俄國的和波蘭的社會民主黨及第二國際對於民族自決權之關係

在一九〇三年舉行大會時，俄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和波蘭社會民主黨對於民族自決權問題，發生過不同的意見。在這次大會通過了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綱領，雖然波蘭社會民主黨的主席團提出抗議，反對本綱領的第九條（承認民族自決權）但結果仍然是成立。自那時以後，波蘭社會民主黨要求取消我們的綱領第九條，或是將其他語句代替之。

在俄國社會民主黨是無條件的一定要承認被沙皇所壓迫的民族得有自決脫離俄羅斯，這樣方可達到他的德謨克拉西和社會主義的目的。因為統轄於俄國的被壓迫民族，占全人口百分之五十七，共計一萬萬人以上，這些民族大部分住在邊境地方，有一部分民族較大

俄羅斯民族，更有文化，有一部分民族的政治制度特別野蠻，帶有封建制度性質，德謨克拉西的資產階級革命，亦尚未告成。我們黨在一九一二年恢復了一九〇三年已經通過的一個議決案，重新肯定民族自決權，而根據以上所說的理由，更具體的證明他的意義。在一九一四——一六年，大俄羅斯愛國主義，不但在資產階級之中，並且在機會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之中（如路班諾維漢，普列哈諾夫，『我們的事業』雜誌的主筆某某等等）頗為猖獗，因此更使我們熱烈的要求承認民族自決權，而判定那些否認民族自決權者在實際上就是輔助大俄羅斯民族的愛國主義和沙的主義。我們黨聲明絕對的不擔負反對民族自決權的責任。

波蘭社會民主黨最近討論民族問題中有以下的思想。（見波蘭社會民主黨在企米野爾凡爾特會議的宣言）。

在此宣言中，咀罵德國和其他國家的政府，因為他們將波蘭的區域當作互相賠款的抵押品，使波蘭民族喪失了自決運命的力量。『波蘭社會民主黨極堅決的極嚴重的反對將一個國家瓜分。』他們咀罵社會主義黨，使他們已經將解放被壓迫民族的事業，交給德皇。他們又主張社會民主黨只有參加於將臨的國際無產階級之社會主義的鬥爭，方能破壞這個壓迫民族的枷鎖，和取消各種外國勢力的統治，方能保護波蘭民族普遍自由發展的能力，在全世界民族同盟之中，成爲平等的一分子。他們的宣言，認爲波蘭民族的鬥爭，是雙重的骨肉的殘殺。（見一九一五年九月二七日出版的國際社會主義公報第二期第十五頁，

有俄文譯本在國際黨與戰爭叢書——一九一五年第一期第九七頁，俄國社會民主黨組織委員會國外秘書處，發行於瑞士次都里黑城。）

這篇宣言，總而言之，與承認民族自決權的原則，可沒有什麼分別，不過他們在政治上的政治說法，則較第二國際大部分的綱領和議決案，還更不明顯，更不確當，當波蘭社會民主黨在政治生活中企圖與資本主義或與將來的社會主義制度相適應時，那麼更明顯的證明他們不承認民族自決權是大錯而特錯。在一八九六年倫敦國際社會主義大會上議決承認民族自決權，應根據上述原理加以下列說明：

第一：此項要求在帝國主義時代之下有特殊的必要。

第二：一切政治德謨克拉克西的要求，即此項要求亦在其內，在政治上均有相對的價值與階級性的內包。

第三：必須分析被壓迫民族的和壓迫民族的社會民主黨應盡的責任。

第四：機會主義黨和考茨基派所承認之民族自決權，按政治的意義上，是一個空談的，不確切的，是純粹偽善的。

第五：那些強大民族的社會民主黨（即大俄羅斯民族，英美民族，德意志法蘭西，意大利，日本等民族。）若不提倡被各該民族所統轄的殖民地之自由分立，則在實際上是與愛國社會主義黨完全相同。

第六：一切德謨克拉西政治的根本要求，及爲推翻資產階級政府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直接鬥爭，均須從事於此項要求而奮鬥。若是容納這些弱小民族的觀點，尤其是波蘭社會民主黨的觀點，到國際黨來，那就成爲理論上底錯誤，馬克思主義被蒲魯東主義所代替了，因爲波蘭社會民主黨與波蘭資產階級及其誑騙人民的民族主義口號奮鬥的結果，竟至無理的否認民族自決權，這些弱小民族的觀點，實際上是無形的輔助了最危險的強國民族的愛國主義和機會主義。

附言：最近在一九一六年三月三日出版的（新時代）考茨基公開的伸展他基督門徒的手，充當最醜惡的德國愛國主義黨的代表，並且說，奧君主國不必講被壓迫民族之獨立自由，然而俄國的波蘭却須得獨立自決；這是考茨基對於德皇維廉二世和德國大軍閥奧登堡充當一個小僕的好意，也就是考茨基主義之難能可貴的榜樣。

這篇全文於一九一六年初登在德國雜誌。

以後一九一六年十月翻印於社會民主黨雜誌，簽名者爲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出版部社會民主黨雜誌編輯處。

第三國際第二次大會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決議案

列寧

一·資產階級德謨克納西，依照它的本性，對於一切平等的問題，慣抱着抽象的或形式的態度，對於民族平等的問題，也是如此，在人類個性平等一標語之下，資產階級德謨克納西聲言無產階級與私有財產者，被壓迫者和壓迫者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而暗地裏却以此欺騙被壓迫的階級。平等之思想之本身，乃是商品生產的關係之反映，它被資產階級變為反對消滅階級的工具以人類個性絕對平等做藉口。平等的要求之實際的意思，是在於階級之消滅。

二·為着符合我們的根本任務，反對資產階級德謨克納西，揭破它的虛偽的假面具。共產黨是覺悟的無產階級為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而奮鬥的政黨，應當對於民族問題；第一，不以抽象的或形式的原則為觀點，而以歷史的具體的尤其是經濟的情勢為觀點。第二，要把被壓迫階級的利益從普通全國民衆的利益的觀念分將出來；第三，把被壓迫的民族，不獨立的，無法律平等的民族，同壓迫的民族分開，而與資產階級德謨克納西的虛詐相反，——我們要知道這一種資產階級的虛詐，本是財政資本與帝國主義時代的特性，資產階

級擾亂民族平等的觀念，掩飾殖民地的受壓迫。

三·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帝國主義戰爭，在各民族與全世界被壓迫階級的面前，非常明顯地把資產階級德謨克納西的虛詐揭露出來。所謂西方德謨克納西的凡爾塞和約，實際上，其壓迫弱小民族比德皇及德國軍閥在布列斯立托瓦所訂之條約，還更野蠻，還更卑鄙，國際聯盟及一切戰爭後帝國主義協約國的政策，更揭露了這一種真理；促進各國的，無論是先進國家的就是殖民地的勞働羣衆之革命的鬥爭，加速破壞了市繪式的民族幻想——以爲在資本主義下，民族的平等與協作是可能的。

四·從以上所解釋的根本的原理，可以確定共產國際對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政策——要使各國家與各民族的無產階級，勞動羣衆聯合起來，共同做革命的鬥爭，推翻地主與資產階級。因爲只有這個聯合，才能保障對於資本主義的勝利；若不推翻資本主義，則一切民族的平等與階級的消滅是不可能的。

五·現在世界政治的環境，已將無產階級專政放在議事日程上面，一切世界政治的狀況，都集中於這個中心點，全世界資產階級反對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的爭鬥；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指導的，有全世界先進工人的蘇維埃運動，及深信非蘇維埃政權的勝利，不足以完成推翻帝國主義之殖民地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

因此在現在的時候，不可僅限于承認或宣言各民族勞働者間的接近，而必須使一切民

族與殖民地解放運動同蘇維埃俄羅斯結一很堅固的同盟。且照着每一個國家之無產階級運動發展的程度或每一個落後的國家之資產階級解放運動發展的程度，而規定這一種同盟的形式。

聯邦制度是各民族勞動者完全統一之過渡的形式。聯邦制度在事實上已經表示出本身的適宜，如在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對於其他蘇維埃共和國的關係及對於內部各民族的關係。

共產國際的任務，在這方面，是要在發展的過程中，用經驗來研究，審查建築在蘇維埃制度上面之初生的蘇維埃聯邦運動。承認聯邦制度為達到完全統一之一個過渡的形式，必須趨向最密切的同盟，同時又要注意：第一，無蘇維埃共和國堅固的同盟，則被全世界帝國主義列強所圍繞的蘇維埃共和國，是不能保持存在的；第二，蘇維埃共和國間，應有很堅固的經濟同盟，否則為帝國主義所破壞的生產力之恢復，與勞動階級生活的改進，是不能實現的；第三，建設全世界經濟統一的趨向，在資本主義下，已經表露出來，而惟有到了社會主義時代，此趨向才能完成。

六·在國家內部關係之範圍內，共產國際之民族政策，不能限於形式的，毫無實際上之價值的承認——一切民族皆是平等的；只有資產階級之民主派是這樣形式上的承認，無論他們承認自己是否如此，或稱自己為社會主義者，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者，總不能做到

民族間的實際平等的。

不但在共產黨的宣傳中，——在議會內或在議會外——要極力揭破資本主義國家破壞民族平等壓迫弱小民族的黑幕，指示資產階級德謨克納西的憲法之無用；而且要：第一，向羣衆解釋只有蘇維埃制度能真正的給民族的平等，開始組織無產階級，然而團結一般勞動羣衆與資產階級奮鬥，第二，一切共產黨直接幫助殖民地民族及一切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運動。若不如是，則反對殖民地民族之受壓迫，或承認一切民族皆有自決權，不過是虛話而已，這就是第二國際政黨的政策。

七·口頭承認國際主義，而在宣傳鼓勵的時候，則暗代之以市繪的民族主義與和平主義，這不但是第二國際政黨中之普遍的現象，就是從第二國際退出的或自稱爲共產主義的政黨，也有很多是這樣的行爲。與小資產階級的民族成見（這種成見在種種形式上表現出來，如人種的仇恨，民族的誣謗，反猶太主義）奮鬥，且使之爲重要的行動，則將一國的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支配世界的政治）改爲國際的無產階級專政（至少也爲許多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能够支配世界的政治）之責任更迫切而重大了。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宣佈承認民族平等爲國際主義，而保留着（現在且不必說這種承認是口頭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民族自利主義；可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的要求爲：

a. 一國的無產階級的奮鬥，要以國際無產階級的利益爲標準；

b. 無產階級已得勝利，資產階級已被推翻的民族，爲着消滅國際的資本主義，要能有這大的犧牲。

因此，在完全資本主義而有工人政黨（的確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國家中，與投機主義的市僧，和平主義的虛偽（它們將國際主義的觀念混亂了）實行奮鬥，實爲現在第一重要的任務。

八·對於封建的宗法的關係還鞏固之落後的國家及民族，便特別謹記以下之數點：

a. 一切共產黨應在事實上幫助這些國家之革命的解放運動，幫助的形式應以該國家的共產黨之力量爲轉移。

壓迫的國家之工人，應當爲積極的幫助，因爲殖民地依賴壓迫的國家工人之處甚多，關係也較密切。

b. 應極力與反動的中世紀的神權階級的影響（如傳教會）奮鬥。

c. 特別要幫助落後的國家中之農民運動，反對一切封建制度的統治及遺跡；務使農民運動帶有更革命的性質，將農民與一切被壓迫羣衆聯合起來，組織蘇維埃同時實現歐洲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同東方的一切落後的殖民地的農民革命運動之大團結。

d. 必須與大同教主義及其他同樣的派別奮鬥，因爲它企圖聯合解放運動反對歐美帝國主義藉以鞏固可汗地主神父的地位。

在落後的國家中，應極力免除資產階級德謨克納西的解放運動沾染着共產主義的色彩；共產國際要幫助殖民地與落後的國家之革命運動，是欲使落後的國家之將來無產階級政黨的份子，在自己特別責任意識上，有所團結，有所訓練；這一種特別責任，是在本民族中與資產階級德謨克納西運動奮鬥。

共產國際在落後的國家中，應與資產階級民主派暫時地妥協或協作，但是絕不能與他們混合，而要保存無產階級運動之獨立性，雖然這種無產階級運動或尚在萌芽的形式。

在一切落後的國家之勞動羣衆中間，應極力說明，揭破帝國主義國家的虛詐——帝國主義國家利用被壓迫國家中之特權階級；表面上建設政治獨立的國家，而在實際上，在經濟財政與軍事方面，則全爲依賴帝國主義國家的國家，協約國的帝國主義與猶太的資產階級勾結，主張光復猶太的故土，在巴勒斯坦建設猶太國家，——照表面上是很正大的，其實在巴勒斯坦猶太人，猶佔很小的少數，若猶太國家建立了，不過是把亞拉伯人給英國剝削罷了，犧牲罷了，這實在欺騙被壓迫民族的勞動階級之最好的一個例證。在現在國際環境之下，除了蘇聯而外，是沒有什麼救星的。

九．帝國主義列強對於弱小殖民地之時間很久的壓迫，使被壓迫民族中的勞動羣衆，不但對於他們的壓迫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懷着仇視，就是對於壓迫他們的國家中之無產階級也沒有信任。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各國社會主義首領之叛變，在「保護祖國」一

口號中，極力爲自己國家中的資產階級出力，壓迫弱小民族，強掠殖民地，自然要增加被壓迫的民族中之勞働羣衆對於壓迫他們的民族中之無產階級不信任。消滅此種不信任，與民族的成見，僅僅在先進國家裏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消滅後，而且在落後國家裏經濟起了大變動之後，才可以達到；否則，這種不信任及成見，是不會很快的就消滅了。因此，一切有覺悟的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對於落後的民族間之民族的感情，特別要十分注意謹慎，有時爲着要消滅這種不信任，應該在可能的範圍內讓讓步。若全世界無產階級及一切落後國家中之勞働羣衆沒有自由統一的趨向，則對於資本主義之勝利，絕不能很迅速的完成。

在第一次共產國際大會上的演說

列寧

同志們！我現在要說的，僅限於很簡括的導言，然後同志馬林詳細向大家報告我們在草案中所更改的一切。他報告了之後，做附加草案的同志羅易演說。我們的委員會完全核准了略加更改的原有草案及附加草案。因此，我們對於一切重要問題的意見都能够一致。現在我且略指出幾點來，使大家注意。

第一，什麼是我們草案中根本的重要的思想？這是被壓迫的與壓迫的民族間之差別。我們特別提出這個差別來的——與第二國際及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相反。

在帝國主義時代規定具體的經濟的事實，解決一切民族與殖民地問題，不以抽象的理論而以具體的實際現象作出發點——這對於無產階級與共產國際非常重要。帝國主義時代之特點，在現在的時候，在於全世界分成兩部分：一大部分被壓迫的民族，一小部分壓迫的民族——佔有巨大的財富與武力。差不多全世界上四分之三的民族，屈服於壓迫之下，波斯土耳其及中國雖然非完全殖民地，但為帝國主義的武力所征服，遂成依賴的國家。這一種被壓迫的與壓迫的民族間之差別觀念，不但在從前我所署名印出的草案上面，而且在同志羅易的草案上面處處標出。

同志羅易的草案是以印度及受英國壓迫的各大民族立論的，所以對於我們特別有意義。

第二個重要的思想，在現在的——帝國主義戰爭後的世界狀況之下，各民族間的關係，國際間的情勢，是以少數帝國主義集團與蘇維埃運動和蘇維埃國家的鬥爭而規定的。倘若我們把這個忘却了，則我們將不能認清民族與殖民地問題，雖然我們把話說得很遠很大，只有把此點認清之後，共產黨才能解決一切強國與弱國之間的政治問題。

在第三層，我想特別將落後的國家中之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運動提出一下。因為這個

問題引起了許多爭論的是：共產國際與共產黨應當幫助落後的國家中之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運動，在原則上是對的；在這種爭論的結果，我們一致的把『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運動』改說為民族主義的革命運動，每一民族主義的運動只能是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這是毫無可疑的事情，因為在落後的國家中之大部分的人民是農民，而農民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關係之代表。若以為落後的國家中之無產階級政黨，對於農民運動不抱一定的態度，不實際地幫助他，而能實行共產主義的政策——這實在是空想了。

但是，若此處我們僅說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運動，則將混亂改良的與革命的運動之分別。在近幾年來，在落後的與殖民地的國家中，這一種分別非常顯明，因為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用盡力量企圖在被壓迫的民族中發展改良主義的運動。在壓迫國家的資產階級之間，已經表現出親近的現象或者在多數的情形之下，被壓迫國家的資產階級一方面雖然幫助民族運動，而同時却與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妥協，共同壓迫革命運動與革命階級。在我們的委員會之中，我們詳細地指明，並且以為注意這種差別，而將『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語意改為『民族主義革命的』。這個改變的意思是：我們共產主義者幫助殖民地的資產階級的解放運動，僅僅當這種運動真正是革命的，且運動的代表者不阻礙我們組織農民和被壓迫羣衆的時候。倘若沒有這種條件，則我們共產主義者應當奮鬥，反對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及附屬於資產階級的第二國際的首領。在殖民地國家之中已經存在改良主義的政黨

，他們自稱爲社會民主黨或社會主義者。在我們的草案中，這種差別表白得很詳細，我們爲我們的觀點現在應當比從前更確些。

此外，我還想將農民蘇維埃提出一下。俄國共產黨在過去屬於俄皇下的殖民地中之工作（如在落後的土耳其斯坦）在我們面前放一問題：如何在資本主義前的條件之下施行共產主義策略；因爲這些落後的國家之特點，就是在牠們中還是資本主義前的關係統治一切，而絕對沒有純粹無產階級運動的可能。在這些國家之中差不多沒有工業的無產階級。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在這些國家之中拿了並且應當拿着指導者的地位。我們的工作指明我們，在這些國家之中，要征服許多巨大的困難；然而工作的結果也指明了我們，雖然有許多困難，還是能在羣衆中鼓起獨立政治運動的趨向，雖然沒有無產階級。這種工作對於我們比較對於西歐的同志更難，因爲俄國的無產階級已經指揮國家的工作。很明顯地，在半封建制度下的農民能夠領會蘇維埃組織的思想，而且實現之於事實，也很明顯地，被壓迫的羣衆不僅受商業資本的剝削，而且受諸侯，國家的剝削，自然在自己的條件之下也能適用這種工具——蘇維埃組織的思想非常簡單，不但能適用於無產階級的關係，而且能適用於農民的或封建的關係上面。我們在這個範圍之內的經驗還不大，但是，當委員會討論之時，參加了許多殖民地的代表，他們指示了我們：共產國際應當注意農民的蘇維埃，不僅對於資本主義國家是一種工具，而且對於落後的，留存着資本主義前的關係的國家亦然，共

產黨及其共產黨接近的分子，應當宣傳農民蘇維埃的思想在落後的國家與殖民地的羣衆裏。共產黨應當在可能的範圍內竭力建設勞動羣衆的蘇維埃。

此地是我們面前，有很有趣味的而且重要的實際工作。現在我們關於這一方面的經驗雖還不大，然而我們漸漸積聚了許多資料。先進國的無產階級階級應當幫助後進國的勞動羣衆，——這件事情是無可爭論的。落後的國家之發展能跳出現狀，僅僅在勝利的蘇維埃國家的無產階級與這些被壓迫的羣衆以實際的幫助之時。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委員會作了很興奮的討論，不但關於我簽名的草案，而且還關於同志羅易的草案。羅易此地將辯護自己的草案已一致地改正了幾點。

我們的設問：國民經濟之資本主義階段的發展，對於戰爭後現在的落後的民族（正在解放的而且進步的）是否是不可免的？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不定的。倘若革命勝利的無產階級在落後的民族中實行有統系的宣傳，而蘇維埃國家反用所有的力量以幫助，則資本主義階段之發展對於落後的民族是不可避免的意見當然是錯誤的。在一切殖民地與落後的國家之中，我們不僅要組織先鋒隊的中心，黨的團體；不僅宣傳農民蘇維埃組織的思想，趨向將牠適用於資本主義前的條件，而且共產國際要規定一理論的原則——落後的國家先進國無產階級的幫助，能轉入蘇維埃的制度，經過一定的發展的階段到共產主義避免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

對此有些什麼方法是必要的，——提前指明是不可能的。自有實際的經驗告訴我們。但是這是規定的——最遠的落後的民族中之勞動羣衆與蘇維埃的思想很接近；而且蘇維埃組織應當適應資本主義前的社會關係；在這一種方向，共產黨的工作應當趕快開始。

我還想指出共產黨革命工作之意義，不僅僅在自己的國家中，而且還要在壓迫民族用以管轄殖民地的軍隊中工作。

同志克維哥，英國社會黨的代表，在委員會中曾說及此。他向我們說，普通工人以爲幫助殖民地的被壓迫的民衆反對英國的主權，是叛逆，是賣國。不錯，被狹義的愛國主義所鼓動的英美的工人貴族，對於社會主義認爲是一巨大的危險，他們是第二國際的柱石；我們在此地看出附屬於資產階級國際的首領和工人方面的叛逆，第二國際也討論殖民地問題，在巴吉爾宣言中并說得很顯明，第二國際政黨口頭允許要革命行動，但是實際上幫助被壓迫民衆反對壓迫者的行動，我們却看不見。這不但第二國際的政黨是如此，就是有些已退出第二國際而願加入第三國際的政黨也是如此。我們關於這一點應高聲地聲明，并且不能爲人所否認，我們看一看，將來有沒有否認這種聲明的嘗試？這一切所說的都伏在我們決議案的原理上，我們的決議案雖然很長，但是我相信，它是有益的，而且在民族與殖民地問題中，它能促進革命工作的組織與發展。

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附加議案

羅易

一，規定共產國際與被壓迫而有資本主義制度統治的國家（例如中國與印度）中的革命運動之相互間的關係，這是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前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世界革命史現在正在經過這個時期，就是正確明了這個相互間的關係，成爲一定的必要了，歐洲大戰及其結果很顯明的指示了我們：被壓迫國家的羣衆與歐洲的無產階級運動有很密切的關係；世界的資本主義集中化了，例如大批的殖民地的軍隊與工人派送戰場，參加戰爭，這實與歐洲無產階級運動有重要的關係。

二，歐洲的資本主義吸聚自己的力量，最大部分是自殖民地的領土，而非自歐洲工業的國家，爲着保存資本主義的存在，則需要有寬大的剝削的來源，且對於殖民地的市場加以監督或管理。英國——帝國主義的首領，感覺生產過剩的苦痛，已經有一世紀了。倘若沒有寬大的領土做銷售商品的市場與供給原料的來源，則英國的資本主義將久已消滅了。一方面把持非洲，亞洲無數萬萬的居民處於奴隸地位，而同時英國帝國主義也就把持他自已國家中的無產階級，使之服從資產階級的統治。

從殖民地所取得的額外利潤，是現代資本主義之最重要的源泉。歐洲的無產階級僅僅

在這種源泉完全消滅之後，才能推翻資本主義的制度。

歐洲資本主義的國家企圖恢復自己原有的狀況，極力剝削殖民地的天然財富與人的勞働。因為剝削殖民地的居民，歐洲的帝國主義才能給與歐洲的工人中的貴族許多禮物。賄買他們，同時歐洲的帝國主義用輸入自殖民地來的賤價貨品的方法，減低無產階級的生活費；資產階級預備情願犧牲本國內所得的額外利潤；而保存着從剝削殖民地所得的額外利潤。

三，一方面使殖民地分立，一方面在本國內起無產階級革命，如此才能推翻歐洲資本主義的制度。因此，共產國際應當擴張自己活動的範圍，共產國際應當與在被壓迫的國家中之參加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勢力有密切的聯絡。爲着世界革命之早日成功，則必須此兩種勢力爲共同的行動。

四，共產國際是世界革命的無產階級之集合的意志。他的使命是組織全世界工人階級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而實現共產主義。共產國際是一軍事的主體，應當團結全世界革命的勢力。

爲資產階級文化所浸潤的第二國際，却未度量到殖民地問題之重要。對於第二國際，則歐洲而外無世界。歐洲的革命運動與其他非歐洲的革命運動有相互提攜的需要，對於第二國際是不明了的。第二國際的人物不但不與殖民地革命運動以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幫助，

而且自己成了帝國主義者。

五。壓迫東方民族的帝國主義自然阻止了他們的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取消他們達到如歐美一樣水平線的可能；帝國主義的政策，總是趨向於把持住殖民地的工業之發展；所謂土著的無產階級（工業的無產階級）之存在並不久。

土著地方的小手工業生產將位置讓與帝國主義國家之集中的大工業，結果使大部分的人民迫不得已從事農業，而輸出原料到國外去。在別一方面，我們看出土地很快地集中於少數資本家地主之手，使失去土地的農民的數目日見增加。這些殖民地中之大部分人民，都處於被壓迫的狀態之下。這種政策的結果，羣衆反抗的精神僅經過很少數中等階級的智識階級表現出來，國外的壓迫是防礙社會生活之自由的發展之一個大勢力，所以革命之第一步，應推翻國外的壓力。因此，我們幫助殖民地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並不是贊成土著的資產階級之民族主義的趨向，而是開闢殖民地的無產階級之一條解放的道路。

六，我們可以看出日離日遠的兩種運動：

- a，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愛國主義運動，徒欲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實現政治的獨立。
- b，貧苦的農工羣衆爲自己解放的運動，否認一切的剝削與壓迫。第一種運動企圖管理第二種運動，并且已很有成效；但是共產國際應極力反對這一類的管理，而促進殖民地

的工人羣衆之階級的覺悟。因此，殖民地革命之第一步爲推翻外來的勢力，但是最重要而且必要的職任，是建設農工之共產主義的組織，使他們能够隨手建設蘇維埃共和國。因此，在落後的國家中，民衆之到共產主義，並不必經過資本主義之發展，而只要受先進國有覺悟的無產階級之指導，發展階級的覺悟就可以了。

七，實際的力量，殖民地解放運動之基礎，並不限於很狹的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之民族主義派。在殖民地中已經存在許多有組織的革命的政黨，並且與工人羣衆有密切的關連。共產黨欲與殖民地革命運動有關連，應經過這些政黨或團體，因爲牠們是工人階級的先鋒。在現在的時候，牠們的數量還不多，但是牠們是羣衆意志的表現，引導羣衆向革命的道路上走。一初帝國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對於殖民地中無產階級的政黨，應當有密切的關連，可以經過牠們與一切革命運動以物質的，精神的幫助。

八，殖民地的革命在初期不能成爲共產主義的，但是當革命的開始，共產主義的先鋒就佔在領導的地位，則革命的羣衆可以因漸漸所得着的革命的經驗，而走上達到目的之正確的道路。倘若完全用共產主義的原則解決農民問題，則將成爲很大的錯誤。在發展的第一階段，殖民地中之革命應適用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政綱，如瓜分土地等。但是這並不是說，革命的指導應當放在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手裏。無產階級的政黨應當在最初的可能時，極力宣傳共產主義的思想，建設農工的蘇維埃。這些蘇維埃之工作，應當如先進的資本

主義的國家中之蘇維埃共和國的工作一樣，好爲着絕對地推翻全世界資本主義的制度。

十月革命與民族問題

史大林

民族問題並不是一種什麼獨立的問題，也不是求久存而不廢的問題。民族問題祇是改造現實社會制度的一般問題的一部分，而完全以社會環境的條件，國家政權的性質及社會發展一般的進行；才能判定的。這個理論在俄羅斯革命時期表示得特別顯明，當民族問題和民族運動在俄羅斯邊境發動時，他便急速地隨着革命的出發和進行改變了他本有的內容這是衆目共覩的。

(一) 二月革命與民族問題

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時(即一九一七年二月間)在邊疆的民族運動都含有資產階級解放運動的性質。俄國各小民族自古以來被『舊式制度』所壓迫和剝削，亦開始感覺到自己的力量而憤激起來向壓迫者決一死戰。

那時民族運動的口號是『消滅民族的壓迫』，在俄國邊疆，剎那間，皆設備各『全民族』的機關；民族的資產階級德漢克拉克西的智識階級是主要的領導者。民族的資產階級竭全力

組成了『全民族』的團體，就是拉特維亞，惡斯特，立陶宛，格魯齊亞，阿爾面尼亞，阿則爾白章，高加索，奇爾吉斯坦，伏爾加河的中流等處皆稱爲『國民議會』，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稱爲『拉打』，被塞爾拉辟亞稱爲『四法土耳其則立』，克里姆和把七基立稱爲『苦爾台』，土耳其斯坦稱爲『自治政府』等等。他們都以爲『沙皇制度』是壓迫民族的根本原因，因此高唱由『沙皇制度』之下解放出來而建設民族資產階級的國家。他們對於民族自決權以爲即是民族資產階級在邊疆區域得以奪取政權之權力，而利用二月革命的機會以組織『自己』的民族國家。至於革命再向前發展，他們絲毫沒有注意，並且也不能注意，因爲那些資產階級的機關，對於革命始終是不合算的。但是他們同時又完全忽略了帝國主義之必然要代替沙皇制度，此赤裸裸的帝國主義是弱小民族更有力更可怕的仇敵，是壓迫民族之新的基礎。沙皇制度雖已消滅新成立的資產階級政府，對各弱小民族的壓迫並沒有取消。舊的『粗鹵』的壓迫形式變而爲新式『精緻』的更可怕的壓迫。李俄夫——米流可夫——克倫斯基三人的政府不但沒有割絕舊時壓迫民族的政策，並且又來重新攻擊芬蘭（一九一七年夏季解散國民議會）及烏克蘭（破壞烏克蘭各種文化機關）。這還不提，因爲該政府的本性是帝國主義，所以仍舊號召人民繼續戰爭，籍以佔據新地盤，奪取新殖民地和多屈服弱小民族。此種行動，不僅是由於帝國主義內部的本性所使然，並且由於西歐各個舊的帝國主義國家來推動他。因爲他們都盡力的謀想征伐新領土和宰制小民族而縮減俄

國的勢力範圍。

在帝國主義戰爭的過程中，能看出各帝國主義國家的互相鬥爭是爲了要屈服弱小民族藉以維持其生存。沙皇制度消滅而米流可夫——克倫斯基政府的成立絲毫沒有加以什麼改良的政策。自然那些在邊疆的『全民族』團體一表示獨立的趨向，就立刻受俄國帝國主義政府的阻礙。不過各該民族團體只圖建設資產階級的政權，而絲毫不顧自己的工人和農民的根本利益，所以農工界對於他們也表示不滿意，又因那時的『國民軍』祇是火上添油，於是更惹起他們的嫉恨。由上層來的恐怖，（指工農羣衆的憤恨）國民軍更使其猛烈的加甚，因此『全民族』的團體對內對外皆無法可以防禦，方始萌芽的資產階級民族的國家，尙未興盛而即墮落。

因此資產階級德漢克拉西所提倡之民族自決權之原則變成了一句廢話，失掉了革命的意義。自然在此種情形之下更無所謂『取消民族的壓迫』和『弱小民族國家的獨立』了，這是很明白的除了與帝國主義斷絕關係，顛覆『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使勞動羣衆自己奪取政權外，決不能解放被壓迫民族的勞動羣衆和消滅民族的壓迫。

這個理論在十月革命以後，表現得特別顯明。

（二）二月革命與民族問題

二月革命在內部含有不可調和的矛盾。革命的告成雖是工農的力量，但其結果反落於資產階級手中。

工人農人之暴發革命，是要停止『戰爭』達到『和平』。但是奪取政權的資產階級。極想利用羣衆的熱烈來繼續『戰爭』而反對『和平』。那時候國內的經濟恐慌和糧食的缺乏到了極點。工人的要求，是沒收私人的資本，和私人經營的企業；農民的要求，是奪取地主的土地，但米流可夫克倫斯基的資產階級政府爲保護地主與資產階級的利益起見，乃堅決地抵抗工人和農人。由工農之手所造成的資產階級革命竟成爲壓迫者的御用品。

因受帝國主義戰爭的重大負擔，以至國脈凋蔽，經濟毀壞，糧食恐慌，在戰線上的軍隊均行騷擾和脫逃，工廠和作坊陸續地停閉。國內發生飢荒，二月革命及其內部的矛盾很顯明的表示他並不是一個『救國』的方法，米流可夫克倫斯基的政府明明的無能力可以解決革命的根本問題。必須有新的社會主義的革命，才能由帝國主義戰爭與經濟恐慌的絕路中找出一條生路來。

由十月政變，方始開闢此種革命。

十月革命推翻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政權，創造了勞動政府，這一打擊將二月革命內部的矛盾消滅淨盡。蘇維埃政權在革命過程中的設施，是取消地主和富農的全權，將土地交給農村中的勞動羣衆，奪取工廠和作坊交給工人來管理。與帝國主義決裂，停止掠奪的戰爭

，公布秘密條約，揭露侵略國外領土的政策。宣告被壓迫民族勞動羣衆得有民族自決權，承認芬蘭的獨立。

這就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

在俄羅斯中央地帶開始的革命，不能永久停留在狹窄範圍內，勢必擴張到邊境去，其實革命的潮流自北方第一天開始以後，便已逐漸普及於全俄羅斯，波及於各邊疆。但是革命的浪濤到了邊疆，即遭着障礙，就是十月以前所成立的那些『國民議會』和特別區的『自治政府』（頓河一帶，庫班一帶，西北利亞）。這些所謂民族的政府，對於社會主義的革命是不願意聽聞的，他們是資產階級的本性，故絕不願意毀壞舊式資產階級的世界，他們反而以爲他們的責任是要竭力保護和鞏固資產階級的世界。這些政府完全是帝國主義的性質，所以他們絕不願與帝國主義決裂；只要有機會，他們並沒有放棄侵掠或屈服其他弱小民族的政策。那些在邊疆的民族政府對於中央的社會主義革命宣告戰爭，是毫無足怪的事。宣戰以後，他們便自然而然的成爲反動的中心，吸引了全俄羅斯的反革命者，那些從俄羅斯出奔的反革命者均聚集到那些地方，於開的編成了白黨的民族軍隊。

可是在各邊境除各『民族』政府外，尚有民族的工人和農人，他們不到十月革命就早已按照俄羅斯中央蘇維埃的規程，組織了革命的蘇維埃。他們未曾與居在北方之弟兄絕斷關係。他們也要求戰勝資產階級，他們也同樣爲社會主義的光榮而鬥爭，因此他們與自己

的「民族」政府的衝突日益加甚，這也是不足怪的。十月革命更鞏固了邊疆的工農和俄羅斯農的聯合，增加着他們對社會主義勝利的信仰和熱情。「民族」政府與蘇維埃政權開戰的結果，使工農與民族政府的衝突，完全決裂，直至公開的暴動，武力的反抗。

全俄工農社會主義聯邦便因此成立了，他是反對俄國邊境各「民族」資產階級政府之反革命同盟的。

有些人說：邊疆各「政府」的鬥爭，是反對蘇維埃無情的中央集權制之民族解放的鬥爭；這是不對的。世界上除了蘇俄之外，沒有一個國家能有這樣寬泛的地方分權制；沒有一個政府能給人民如此完滿的民族自由。邊疆各政府的鬥爭，始終是資產階級反革命反社會主義的鬥爭。他們的民族旗幟，只是拿來誑騙羣衆，藉以遮掩民族資產階級之反革命的陰謀。

可是所謂民族區域政府的鬥爭是不平衡的鬥爭。他們受兩方面的攻擊，外面是蘇維埃政權；內部是自己的工人和農民。因此，民族政府初次開戰即行敗退。

芬蘭工農的暴動，驅走了資產階級的「國務院」，烏克蘭工農的暴動，潰散了資產階級的「拉達」（即國會），工人和農民在頓河庫班西伯利亞的暴動，使卡力金將軍科爾尼羅夫將軍及西伯利亞政府完全失敗。土耳其斯坦貧民的暴動，使自己政府崩頹。高加索的農民革命，格魯齊亞，阿爾面尼亞，阿則爾白章等處的「民族議會」，毫無民衆的幫助。

以上所說的均是顯著的事實；這些事實，表示出邊疆各政府已完全與自己的羣衆分裂。待失敗以後，各民族政府乃『不得已』向西歐帝國主義，全世界弱小民族底壓迫者剝削者請求幫助，來反對自己的工人和農民。

因此，外國的干涉，外國佔領俄國邊疆的時期，便從此開始了。在這時期中更能識破各民族區域的政府之反革命的性質。

到了那時候，大家才明白民族資產階級并不是要從民族的壓迫下解放自己的民族，而是要奪取民衆的利益，要保護他自己的特權和資本的自由。

現在大家才明瞭除了與帝國主義決裂推翻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使那些民族的勞動羣衆奪取政權以外，決不能解放被壓迫民族。以前資產階級用『一切政權歸諸民族資產階級』底口號來解釋民族自決權的原則，在革命的過程中已將他的根性揭破，并完全將他拋棄了。

社會主義對於民族自決權的解釋，是用『一切政權歸諸被壓迫民族的勞動羣衆』的口號，這個解釋已經有了效力，而且能夠適用。如此，十月革命結束了舊式資產階級的民族解放運動，而另開闢了被壓迫民族工人和農民的社會主義運動底新紀元。這個運動的意義，是要反對一切的民族壓迫，反對全世界資產階級的政權，反對帝國主義。

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義

自十月革命在俄羅斯中心及其邊境取得勝利以後，他已不能再停留在舊俄羅斯的領土以內了。在帝國主義戰爭的空氣中，和一般下層民衆的不滿意的情形下，他不能不蔓延及於鄰國，蘇維埃政權實行與帝國主義決裂，並將俄羅斯由強盜的戰爭中解放出來，公布秘密的條約廢除侵略異國領土的政策，宣告各民族的自由和承認芬蘭的獨立，宣布俄羅斯『蘇維埃民族聯邦共和國』，喚起世界的羣衆劇烈的與帝國主義鬥爭；這一切行動，對被壓迫的東方和流血的西方將有極嚴重的影響。

實在說起來，十月革命在世界上是空前的第一個革命。他喚起了東方被壓迫民族勞動羣衆底酣夢，而引導他們與帝國主義鬥爭。在波斯，中國，印度所組織的勞農蘇維埃，都是按照俄羅斯蘇維埃的模樣，由這一點便足以證明。

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個革命，是援救西歐工人和兵士的模範，足以催逼他們從戰爭的與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走上真正解放的道路。奧德工人兵士的暴動，工人兵士蘇維埃的組織，與國不平權民族反對民族壓迫的革命鬥爭，這均足以證明之。

東方的，西方的解放鬥爭尙未完全脫離資產階級民族的外膜，但是這不關緊要；最緊要的，是現在與帝國主義的鬥爭已經開始了，應該怎樣繼續這個鬥爭，使之達到我們最終

的理想。

外國的干涉和國外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只是加重革命的危機，並吸引新的民族參加戰爭，擴大與帝國主義做革命鬥爭的範圍。

如此，十月革命將落後的東方民族和先進的西方民族都聯貫起來，匯合在共同的營壘中與帝國主義鬥爭。

於是民族問題乃從反對民族壓迫的局部問題，變而為各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下謀解放的一個整個問題。

第二國際及其首領考茨基的罪過，唯一的便是：對民族自決權時常加以資產階級的解釋，他們不明白民族自決權之革命的意義，他們不會，也不願以革命的手段公開的與帝國主義鬥爭來解決民族問題。他們不會也不願將民族問題與解放殖民地問題，聯合在一起。奧國社會民主黨，如鮑威爾，綸納爾等等的愚笨，就是他們不了解民族問題與政權問題有聯帶的關係。他們竭力要將民族問題分開，將前者因為『民族文化教育』的問題，而遺忘了帝國主義和被帝國主義所壓迫的殖民地。

有人說：民族自決權和『保護祖國』的原則，在社會主義革命潮流高漲的環境中便已經將他取消了，實際上民族自決權和『保護祖國』的原則並沒有取消，所取消者只是資產階級對於這些原則的解釋。

我們祇要看在帝國主義壓迫下的佔領地之力謀解放；只要看俄羅斯爲抵禦帝國主義的進攻，爲保護社會主義的祖國，而實行革命的鬥爭；我們只要想一想現在奧國內部事變的意義；看一看那些被壓迫的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之蘇維埃的組織；（印度，波斯，中國）我們只須看看這些東西，就能了解社會主義者之解釋民族自決權是有怎樣的革命的意義啊！

十月革命之偉大的世界的意義，最重要者有下列三點：

第一：十月革命擴大了民族問題的範圍，由反對民族壓迫的局部問題，變而爲各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下謀解放的一個整個的問題。

第二：十月革命開闢了廣大的真正的解放道路，足以輔助西方的和東方的被壓迫民族底解放事業，並吸引他們到共同的路線上來做戰勝帝國主義的鬥爭。

第三：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壓迫的東方之間的橋樑，從西方的無產階級經過俄羅斯的革命，到東方的被壓迫民族，建築了一條新的革命的戰線以反對全世界的帝國主義。

現在東方的和西方的被壓迫的勞動羣衆對俄羅斯無產階級所表示的不勝言喻的歡迎與同情，便足以證明之。

現在全世界兇猛的帝國主義者對蘇維埃俄羅斯底痛恨與瘋狂的攻擊，大部分亦足以據此來證明之。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莫斯科

民族問題

史大林

從這個題目，我提出兩個問題；一，問題的地位，二，被壓迫民族之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

一，問題的地位；最近二十年來，民族問題曾有過許多變更，民族問題在第二國際時代與民族問題在列寧主義時代，相差很遠，不是一樣的，這兩時代間民族問題的差別，不但在範圍的廣狹，而且在他內部的性質的異同。

從前，民族問題常牽連到與所謂「開化民族」有關的一切問題，愛爾蘭人，匈牙利人，波蘭人，芬蘭人，塞爾維亞人，及其他歐洲的一些小民族——這就是那些一切無全權的民族，第二國際對他們命運曾經很注意過的，至於幾百萬萬之亞洲人與非洲人，雖然在極慘酷的形式下忍受民族的壓迫，也不值第二國際的一顧，白種人與黑種人，開化人與非開化人，不准立在一個平面上，做出三個或兩個寬泛的，又苦又甜的議決案，極力避去殖民地解放的問題——這就是第二國際行動家所做的勾當。現在這種兩面圓的，半截的態度，在民族問題上，可以說取消了。列寧主義揭破這種不合理的差別，破壞白種人與黑種人及亞洲人與歐洲人中間的牆壁，取消開化的帝國主義的奴隸與不開化的帝國主義的奴隸界限，

而把民族問題與殖民地問題合在一起。並且因此，民族問題從局部的，國家以內的問題，轉為共同的，國際的問題——轉為被壓迫國家與殖民地從帝國主義束縛下解放出來的問題。

從前，民族自決的原則，時常被附會被縮小的民族自治權的意義，許多第二國際的首領，居然把民族自決權改為文化自治權，就是被壓迫的民族有權設立文化的機關，而把一切政權仍放在統治的民族之手，在這種狀況之下，民族自決的思想，險些兒從反對兼併的工具一變而為保證兼併的工具，現在這種紛亂應當算是已經被克服了。列寧主義擴張了民族自決的觀念，以民族自決權為被壓迫國家與殖民地的民族之完全分立權，換句話說，為民族有設立自己的國家權，如此，方免除紛亂的觀念——把民族自決權與民族自治權相混，藉民族的自治做兼併的保證，如此，民族自決的原則，從欺騙羣衆的工具（當帝國主義戰爭時代社會愛國派拿他為欺騙羣衆的工具）變為揭破帝國主義及狹隘的社會愛國主義的黑暗的工具，變為以國際主義的精神教育羣衆的政治工具。

從前，常視被壓迫民族問題，為一純粹的法律問題，高呼「民族平權」屢次宣言「民族平等」，——這就是第二國際政黨的能事！當在帝國主義之下，少數民族剝削其他多數民族而吸其血液，若高呼甚麼「民族平權」「民族平等」，這簡直無異於對被壓迫民族的譏笑！可是第二國際政黨從來把這個事實掩飾了，現在這一種資產階級的法律觀點之

謬誤，在民族問題中，可以說被揭破了。列寧主義把民族問題從高言放語的天上拿到地下，以爲僅宣言「民族平等」，而無產階級政黨不實際幫助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那末，這種宣言，簡直是空話。因此，把被壓迫民族問題轉爲實際幫助被壓迫解放運動，反抗帝國主義，爭取民族之真正平等與真正獨立的問題。

從前，改良主義者把民族問題，視爲單個的獨立問題，而與資本統治，推翻帝國主義，無產階級革命，一切總問題不發生關係。似乎都默認：歐洲無產階級之勝利無須直接與殖民地的解放運動聯合，而解決殖民地與民族問題可以慢慢的，自然地，而不必經過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與對於帝國主義的革命爭鬥，現在這種反革命的觀點，又可以說是被揭露了。

列寧主義指示我們：帝國主義的戰爭與俄國的革命已經確證了民族問題的解決，只有與無產階級革命發生關係，只有站在無產階級革命的上面。而西歐革命之勝利，一定要與殖民地及被壓迫民族之反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相聯合，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總問題之一部分，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之一部分。

現在的問題是如此的：在被壓迫民族之解放運動中，所有革命的可能性已經消失了沒有？倘未消失，是否有無希望利用這些可能性爲無產階級革命，把殖民地與一切被壓迫的國家，從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預備軍，轉爲無產階級的預備軍，爲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

者。

列寧主義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承認在民族解放運動巨浪中，有革命的能力，並且而以利用這種能力推翻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發展的機構，帝國主義的戰爭及俄國的革命，完全證明列寧主義的結論是正確的。

因此，無產階級對於民族解放運動，必然要堅決的實際的積極的幫助。

這並不是說，無產階級無論在什麼狀況之下，在什麼時候，一定要幫助一切的民族運動，我們現在所說的幫助，是幫助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而非鞏固或保持帝國主義的運動，當某一個被壓迫國家之民族運動與無產階級利益發生衝突時，當然說不上幫助，所謂民族平權問題，非單獨的，自存的問題，而是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之一部分，應當屬於整個的而且要用整個的觀點去觀察。馬克思在過去世紀之四十年代，主張幫助的波蘭人與匈牙利人之民族運動，而反對奧斯拉夫人與捷克人之運動。爲什麼呢？因爲捷克民族與南斯拉夫族在當時爲反動的民族，爲俄國在歐洲的前哨，爲專制主義的前鋒，而波蘭與匈牙利爲革命的民族。與專制主義鬥爭，因爲倘若幫助當時捷克人與奧斯拉夫人之民族運動，則無異間接幫助俄國君主獨裁政體，使其益形擴張，而俄國之君主獨裁政體却是歐洲之一大障礙，一大仇敵。

列寧說：『德謨克拉西之各部分的要求，（如民族的自決，亦在其中）不是一個孤立

的絕對的，而是全世界德謨克拉西運動（現在的一般社會主義運動）之一小部分。在或種具體條件之下，部分與總體相矛盾，是可能的，在這時候，應該將此一部分犧牲」——錄自列寧文集第十九卷中討論之總表。

我們對於各個民族運動，及對於各個民族運動中的反動的可能性，問題的態度是如此，我們估量這些民族運動的價值，自然應以其對於革命運動之利益為標準，而不是在形式上用抽象的觀點去觀察牠們。我們對於普通民族運動的革命性，也要同樣地仔細地考察一下。自然多數民族運動各有自己的特殊的，相對的革命性，也就如有些民族運動含有自己的特殊的，反動的趨向一樣，在帝國主義壓迫的環境中，民族運動之革命性不一定要在這個運動中有無產階級的分分子，革命的或民主的黨綱及德謨克拉西的基礎，阿富汗皇帝極力圖謀阿富汗的獨立，在客觀上是革命的現象，因為他這種運動能減弱和破壞帝國主義的勢力，雖然他與他的屬下的觀念還是君主式的，如在帝國主義的戰爭時，一些失望的『民主派』，『社會主義者』，『革命黨人』及『共和主義者』——例如克倫斯基與策列鐵里，雪德曼與列諾得利，亨得遜與克萊司，喬爾諾夫與但——的奮鬥。却為一種反動的行為，因為他們粉飾了，鞏固了帝國主義的勝利，埃及的商人與資產階級的智識階級為埃及獨立而奮鬥，照着我們以上所說的原因，在客觀上是一種革命的奮鬥，雖然在埃及民族運動中，一切首領都是資產階級的出身；雖然他們反對社會主義，可是英國的工人政府為保留埃及的

不獨立而奮鬥，這一種奮鬥却爲反動的。我們莫要以爲工人政府的閣員是社會主義者，是『贊成』社會主義的，我們不願再說別的一切比較大的民族運動，如印度的，中國的民族運動，這些民族運動步步向着解放的路上走去即或有時被牠們用破壞形式的德謨克拉西制度，可是牠們對於帝國主義如一個大鐵鎚，能給帝國主義者一打打擊，就是說他們走的是革命的路。

列寧的話自然是不錯的，他說，估量被壓迫國家之民族運動的價值，不應當用形式的德謨克拉西的觀點而應以在反對帝國主義之過程中所得的實際的結果做觀點，應視民族運動爲世界革命運動之一部分。

一，被壓迫民族之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解決民族問題，列寧主義以下列幾種情勢爲出發點：

A. 世界分成兩個營壘：（一）是極少數所謂開化的民族，他們佔有財政資本剝削地球上之大多數人民；（二）被壓迫的國家與殖民地之大多數人民。

B. 殖民地與一切不獨立國，爲財政資本所壓迫所剝削的，構成帝國主義勢力的最大來源。

C. 殖民地與一切被壓迫國家的民族之反對帝國主義的奮鬥，是他們從壓迫和剝削下解放出來的唯一的道路。

二，最重要的殖民地與不獨立國，現在都已走向民族解放的道路，不能不引起世界資本主義趨於恐慌。

D. 先進國之無產階級運動與殖民地解放運動的利益，要求這兩種革命運動的形式聯合起來共同向着共同的仇敵——帝國主義奮鬥。

E. ……先進國的勞動階級的勝利與被壓迫民族從帝國主義下的解放，若無共同的聯合革命戰線，是不可能的。

F. 聯合革命戰綫，若無先進國的被壓迫國的無產階級之極力的幫助——反對自己祖國的帝國主義，則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壓迫其他民族的，不算是自由的民族」。（馬克思）

三，無產階級對於民族解放運動的幫助，就是要保障「民族有分立權」，「民族有自建國家權」，一切口號能夠實現。

H. 這個口號不實現，則民族在統一的世界經濟（構成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上面的合作的進行是不可能的。

I. 這一種民族的聯合，僅僅能自由地發生，僅僅能在各民族間相互應用相互友愛的關係上面發生。

因此民族運動有兩方面，有兩種傾向：

一，在政治上，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及剝削的基礎上面而發生的傾向；
二，在經濟上，民族間實現經濟的接近，即與構成統一的世界市場及世界經濟相關聯的傾向；

列寧說：『發展的資本主義知道民族問題之兩個歷史的趨向，第一是民族生活與民族運動之驚醒，反對任何一種民族的壓迫建設民族的國家，第二是民族間關係之日益發展日趨接近，消弭民族間的隔膜，建設國際的經濟，政治與科學生活之統一，這兩種趨勢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世界公律，第一種趨勢已經在資本主義發展之初就甚明顯，第二種趨勢則表示成熱的資本主義轉向社會主義的社會』。

對於帝國主義，這兩種趨勢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若不用武力維持剝削殖民地於單一的整個的範圍內，則帝國主義不能生存，因為帝國主義之使民族接近，只有兼併或霸占殖民地的方法，若非如是，則帝國主義沒有意思了。對於共產主義，則這種趨勢為一件事之兩面，為殖民地解放運動反對帝國主義那件事的兩面，因為共產主義知道：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上面之民族聯合，只有在民族之互相信用，自由調和時，才有可能，建設民族自由的聯合之方法，只有經過殖民地脫離單一的整個帝國主義的統治，而成爲獨立國家。

因此，我們必須極力決然地不斷地向一切強大民族（英，法，意大利，日本及其他：）中之『社會主義者』的狹隘的愛國主義奮鬥，他們不願意反對自己的帝國主義的政府

，不願意幫助他們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之解放運動，不願意殖民地分立成爲獨立國家。

若無此種奮鬥，則所謂訓練先進國的勞動階級，使之真正成爲國際主義者，使之與殖民地及不獨立的勞動羣衆接近，使之真正爲無產革命的預備軍，都簡直是廢話了，倘若俄國的無產階級從舊俄帝國所屬之殖民地中得不到幫助與同情，則十月革命將不能成功，哥恰克與田尼庚等將不至於失敗，但是欲得到這些被壓迫民族的幫助與同情，則俄國的無產階級必先打掉俄國帝國主義的枷鎖，把他們從民族的壓迫下解放出來，若非如此，則也就不可能鞏固蘇維埃政權，實行真正的國際主義建設民族協作之最好機關——所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合，爲將來世界真正民族統一的模型。

所以我們要反對民族的閉關主義與被壓迫國家的社會主義者之孤單主張使他們要舉起民族運動的鐘，明瞭自己國家的解放運動與先進國無產階級運動有什麼關係。若非如此，則所謂被壓迫民族之無產階級獨立政策及他與先進國無產階級之階級的團結，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推翻共同仇敵的鬥爭都毫無意思，若不如此則國際主義的實現，也是不可能的。

訓練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之勞動羣衆使之成爲真正國際主義者，惟有用這個方法。列寧關於共產主義之兩重性的工作即以國際主義教育工人的工作說：「這一種訓練能在大民族中和小民族中，壓迫民族中和被壓迫民族中，兼併民族中和被兼併民族中，都是

具體的一樣的麼？

「很明顯地，不是一樣的，到一個目的去，到民族間完全平權，完全親近那個目的去，應當要走種種不同的具體的道路，如一點在中間，大家向這一點走，無論從那一方面開步，都是一樣。倘若某一個強大的壓迫的兼併的民族，社會主義者宣傳民族之聯合，而忘却了（那怕是瞬間）他的尼古拉第二，威廉第二或普恩加萊也想用兼併的方法同小民族聯合起來，例如尼古拉第二想同加里齊亞聯合，威廉第二想同比利時聯合等；則這個社會主義者在理論上將變成滑稽的論者，在實際上則變成帝國主義的走狗。

「在壓迫國家中對於工人之國際主義的訓練其重心在於堅持被壓迫國家之分立，無此，則無國際主義，我們有權力說而且不得不說；倘若壓迫民族中之某一社會主義者不如此宣傳，則彼就是一帝國主義的一惡漢。這是一種無條件的要求，雖然在未實現社會主義以前，分立的機會只有千分之一，是可能的。

「反之，小民族中之社會主義者應把宣傳的重心放在我們公式的第二字即「民族自由結合」口號上面，他能不拋却自己國際主義者的義務，而主張自己民族之政治的獨立，或主張加入任何一個國家，但是在一切情形之下，他應當反對小民族的閉關主義，孤獨主義特殊主義，應當為全部的和共同的打算，應當主張部分的利益，並服從全部的利益。或者有一些人們，毫不對問題想一想，而以爲大民族中的社會主義者主張「自由分立」，弱小

民族中社會主義者主張「自由聯合」這是一種矛盾的現象；但是倘若我們略想一想，就可以明白達到國際主義和民族聯合，除開以上所說的，沒有別的路可走，也不能有別的路可走」。

摘譯（斯大林著列寧主義之基礎第六篇）

論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

史大林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在共產國際執委南斯拉夫委員會上的講演——

同志們！我認爲舍米契同志並沒有完全認清楚布爾塞維克對於民族問題的基本立場，布爾塞維克無論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後都從來沒有把民族問題與一般的革命問題分開過。布爾塞維克對於民族問題基本態度就是：布爾塞維克歷來都把民族問題當作與革命前途密切聯繫着的一個問題。

舍米契同志引證了列寧的話，說列寧曾經主張把民族問題歸入憲法中去解決。舍米契同志的這種說法，意思就是說列寧會認爲民族問題是憲法問題，也就是說，不是革命的問問題，而是改良的問題。這完全是不對的。列寧從來沒有作過（而且也決不會作）這種憲法的幻夢。只要把他的著作看一下就可以相信這點。即使列寧曾經說過憲法，但也並不是說

主張用憲法的手段來解決民族問題，他所主張的是用革命的手段來解決民族問題，就是說，他把憲法只是看作革命勝利的一種結果。我們蘇聯也有憲法，而且這個憲法確實也反映到民族問題的解決。可是，這個憲法並不是與資產階級妥協的結果，而完全是革命勝利的結果。

此外，舍米契同志又引證我在一九一二年所著的論民族問題的那本書，極力想在那裏找出間接的論據以證明他自己的正確。但這種引證却絲毫沒有得到一點結果。因為他不僅沒有找到，而且也不能找到一個引證或半點含糊的理論來證明他對民族問題的那種「憲法主張」。爲了證實我這一句話起見，我可以從那本書上引一段話給舍米契同志看，在那一段話中我把奧大利式的解決民族問題方法（憲法的手段）完全與俄國馬克斯主義者的解決方法（革命的手段）對立起來的。

那本書上是這樣說的：

奧大利人想用小的改良的方法和緩慢的步驟來實現「民族自由」。把民族的自治當作了實際的辦法，他們并不打算起根本的變動，也並不想作民權的解放運動，這種運動在他們的前途上是沒有的。但是俄國的馬克斯主義者是把「民族自由」的問題根本的變動，與民族解放運動相聯繫着的，并不打算實行改良的方法。這也就根本的改變了俄國民族底命運」。

我想這裡已經說得很明白了。

這并不是史大林個人的觀點，而是俄國馬克斯主義的歷史中民族問題的提法曾經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十月革命前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十月革命的時期。在第一個階段中，民族問題完全當作了整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問題底一部分，也就是說，把他當作了整個的工農革命專政問題底一部分。及至第二個階段，民族問題已擴大起來，而變成了殖民地的問題，民族問題已經由國家內部的問題變成了世界的問題——這時候我們就已把民族問題看作了整個的無產階級革命問題的一部分，即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底一部分。但無論在這兩個階段的任何一個階段上，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都是絕對地革命的。

我想，舍米契同志對於這一切還是沒有完全明瞭的。因此他企圖把民族問題降低到憲法的立場上。就是說，把民族問題當作了改良的問題。

從這個錯誤中也就產生出了他的另一個錯誤：他不願意把民族問題在實質上看作農民問題。這并不是土地問題，而是農民問題，因為這兩樣東西是不同的。至於說民族問題不能與農民問題混為一談，因為除了農民問題之外，民族問題還包括民族文化，民族國家等等問題，這是正確的。不過民族問題的基礎，它的內部的實際是農民問題，這也是毫無疑義的。因為農民是民族運動的基本軍隊，沒有農民的這支軍隊，就沒有而且也不會有強大的民族運動。所謂民族問題實際上就是農民問題，正是指這點而說的。我覺得舍米契同志

之所以不願意接受這個公式，也就是因為他沒有估計到民族運動內部的力量，而且也沒有了解民族運動之深刻的民衆革命性。他沒有了解到這一點，而且也沒有估計到這一點，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這在實際上就是沒有估計到運動（例如霍爾瓦特的民族解放運動）內部的潛力，這對於整個南斯拉夫的共產黨是一種非常嚴重的複雜問題。

這就是舍米契同志的第二個錯誤。

舍米契同志企圖把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與國際的環境，與歐洲的整個前途分裂開來，毫無疑義的也是錯誤的。舍米契同志根據現時在霍爾瓦特民族和斯拉夫民族中沒有什麼重大的民衆運動，因此便說，民族自立權的問題，是學院式的問題，至少也不是一個迫切的問題，這種說法，當然是不對的。即使這個問題在現時并不是一個迫切的問題，但如果戰爭一開始，或在戰爭開始的時候，如果歐洲革命一爆發，或者在爆發的時候，這個問題就馬上成了一個非常迫切的問題。但戰爭是必然要爆發的，他們必然是要打起架來的，如果我們把帝國主義的本質和發展觀察一下，對於這一點是勿容懷疑的。

在一九一二年，當我們——俄國的馬克斯主義者提出了民族綱領的第一個草案的時候，在俄羅斯帝國的無論那一個地方都還沒有什麼大的民族獨立運動。可是，那時我們就已認為必須把民族自決權（每個民族的自立權和國家的獨立權）這一項包含到我們的綱領中去。爲什麼呢？因爲我們不僅只根據了當時現有的事實，而且也根據了國際關係整個系統

中所發展着的趨勢，也就是說，我們那時不僅只顧到現在，同時也顧及將來。而且我們知道，如果那一民族要求自立，那俄國的馬克斯主義者就要努力的爲使每個民族都能獲得這種自立權而奮鬥。舍米契臣志在他的演講中歷次引證斯大林論民族問題的那本書。現在且看一看史大林在這本書中關於民族自決和獨立的問題是怎樣說的：

『歐洲帝國主義的發展，並不是偶然的。資本在歐洲已經感覺到狹隘了，因此他就要向外發展，尋找新的市場，賤價的勞動，新的投資場所。但這必然要引起外部的糾紛和戰爭。在這一種內外局勢的匯合之下，俄羅斯的某一個民族必然會起來提出和解決他們的民族獨立問題，這是非常可能的。阻止這種運動當然不是馬克斯主義者的事情。』

這還是在一九一二年寫的，你們知道，這幾句話到後來，在戰爭時和戰後，尤其在俄國無產階級的專政勝利之後，就已完全證實了。

我們更有理由的可以說，在歐洲各地，尤其是在南斯拉夫，特別是在現時，在被壓迫國家的民族革命運動事業已深入，俄國革命也業已取得勝利之後，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同時也必須注意到這一點，就是：南斯拉夫並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他是與某種帝國主義的集團聯繫着的，因此他就決不能逃出南斯拉夫之外所作的那一場惡戰。如果，你要替南斯拉夫共產黨規劃一個民族的綱領——現在所說的正就是這一點——那末，就必須要牢記着，這種綱領不僅要根據現時所有的事實，同時也一定要根據由於國際關係而發生

的並且必然要發生的那種現象。因此，我認爲民族自決權問題必須把也當作一個非常切於實際的迫切的問題。

現在再來講民族綱領吧。南斯拉夫必須引起蘇維埃革命，不推翻資產階級，不獲得革命勝利，民族問題就不能有完滿的解決。這一種主張應成爲民族綱領的出發點。當然，也有例外。例如在戰前挪威脫離瑞典而獨立就是一個例外，關於這點列寧也曾經做過一篇文章很詳細的講到過。但這件事是在戰前，在各種特別順利的環境的湊合之下發生的。在戰後，尤其是在俄國蘇維埃革命的勝利之後，這種機遇就很難得了。至少，這種機會的可能性已經少到幾等於零了。但如果這樣，那麼，我們當然就不能在這種「幾等於零」的立場上來建築綱領。因此，我們必須把革命的主張作爲民族綱領的出發點。

此外，也必須把民族自決直至國家自立的這一項放到民族綱領中去。何以在現時內部的和國際的形勢下非加上這一項不可的理由，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

最後，還有關於不需要脫離南斯拉夫的那些民族之疆土的自主這一項也必須特別列入民族綱領中。凡是認爲這一項可以不需要的人，也是不對的。這完全是錯誤的。在某種條件之下，南斯拉夫的蘇維埃革命勝利之後，有些民族不願脫離南斯拉夫，這是很可能的事，例如在俄國就是如此。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就必須把自主問題放到民族綱領中去，這意思就是說，將南斯拉夫改造成爲建築在蘇維埃制度之基礎上的民族自主國的聯邦。

因此，對於那些願意脫離南斯拉夫的民族，必須予以自立權，對於那些不願意脫離南斯拉夫的民族，就必須予以自主權。

爲了免除誤會起見。我必須說明這點，就是切不可把自主權解作義務或責任。各民族可以享受這一種自立權，但如果他不願意的時候，亦可不享受這種權利——享受與否完全是他自己的自由，這一點是必須認清的。有些同志把自立權變做了一種應盡的義務，他們要求霍爾瓦特民族無論如何地要實行自立。這種主張是不正確的，我們必須放棄這種主張才對。我們決不可將權利與義務混爲一談。

再論民族問題

關於舍米契的文章

舍米契同志現在，在南斯拉夫委員會的討論之後，已完全同意共產國際中俄國共產黨代表的主張，這是很慶喜的事。但如果只根據這一點，便以爲俄國共產黨的代表與舍米契同志之間，在討論前或討論時並沒有爭論過，這也是不對的。舍米契同志對於民族問題的爭論，似乎正是這樣想法的，他極力想把這種爭論歸咎於誤解。但可惜他完全錯了。他在他的文章中肯定地說，我們之間的爭論。完全出於「誤會」，完全是由於他在南斯拉夫委

員會上的 篇演講「沒有翻譯完全」而引起的。換一句話說，就是，他把一切爭論完全歸咎於翻譯者，說他爲什麼而沒有把他的話完全翻譯出來。爲了主張真理起見，我不得不申明，舍米契同志的這種說法是完全不合事實的。如果舍米契同志能够把他在委員會上所講的話（現在保存在共產國際的文庫裡）引證一段出來證明他的這個申明，當然比較好些。但是不知道什麼緣故他沒有這樣做。因此，我不得不再和舍米契同志作一次辯白，這種辯白雖然不很使人舒服，但是完全是必要的。

甚至在現在，當他已完全同意俄國共產黨代表的意見時，在他的主張中也依舊還有許多不清楚的地方，因此，這一種辯白更爲必要了。

我在南斯拉夫委員會上的講演中（閱布爾塞維克第七期）已經說過，我們爭論的問題有三個：（一）民族問題的解決方法問題，（二）在現時歷史階段中之民族運動的內部的社會本質問題，（三）民族問題中之國際作用問題分裂開來，他把民族問題完全歸結於憲法問題。

在第一個問題中，我已經說過，舍米契同志並沒有完全明白布爾塞維克對於民族問題的基本主張。他把民族問題完全和一般的革命問題分裂開來，他把民族問題完全歸結於憲法問題。

這種主張究竟對不對呢？

請你們把舍米契同志在南斯拉夫委員會上（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所說的下面一段

話拜讀一下後，自己去判斷罷。他說：

『可否把民族問題歸到憲法問題中去呢？首先，我們有一個理論上的假設。假定，在×國家中共有A，B，C三個民族。這三個民族，都申明他們願意共同的相處在一個國家裡。在這種情形之下，問題是在於什麼呢？當然，就在於調節這個國家的內部關係。就是說，完全是一種憲法的問題。在這個理論上的假設中，民族問題是歸納在憲法問題中的……如果我們在這種理論上的假設中把民族問題歸入憲法問題中，那時候我們必須說——我一向是這樣主張的——民族自決，直至民族自立，都是解決憲法問題的條件。我只是在這一種立場上提出我的憲法問題』

我想，舍米契同志的這一段話用不到再做一番註解了。很明顯的，凡是把民族問題看作整個無產階級革命問題之一部分的人，就不會將民族問題歸到憲法問題中去。反轉來說，只有把民族問題同整個的無產階級革命問題完全分開來看的人，才會將民族問題歸到憲法中去。

在舍米契同志的演說中曾經說，不作革命的鬥爭，就決不能獲得民族自決權。舍米契同志說：『當然，祇有革命的鬥爭纔能獲得這種權利。這種權利決不是用議會的方法可以獲得的，祇有羣衆的革命運動才能獲得』。但所謂『革命的鬥爭』和『革命的行動』究竟是什麼呢？可不可以將『革命的鬥爭』以及『革命的行動』與推翻統治階級，與奪取政

權，與革命的勝利——解決民族問題的條件——混爲一談呢？當然是不可以的。把革命的勝利當作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條件，這是一回事，但如果把『革命的行動』『革命的鬥爭』當作解決民族問題的條件，那又是一回事。我們必須指出，在憲法的改良的道路上並不是完全丟開『革命的鬥爭』和『革命的行動』。在決定某個政黨是改良的政黨抑是革命的政黨時，主要的標準不是他的『革命行動』的本身，而是它的革命行動的政治目標和政治任務。俄國的孟塞維克在一九〇六年，第一次國會解散之後，不僅主張組織『總同盟罷工』而且甚至於主張『武裝暴動』。但他們總究還是孟塞維克。因爲要知道，他們那時候主張這樣幹究竟是爲什麼呢？當然並不是爲了破壞沙皇制度，也不是爲了造成革命的完全勝利，而是爲了『打動』沙皇政府以獲得相當的改良，擴大憲法，及召集『完善』之國會而已。爲了在舊的統治階級政權的保存之下改良舊制度而作『革命的行動』，這是一回事，這是一種憲法的道路。爲了破壞舊制度，爲了推翻統治階級而作『革命的行動』這又是另一回事，這是一種革命的道路，獲取革命之完全勝利的道路。這其間有根本的區別的。

所以我認爲，舍米契同志在主張將民族問題歸入憲法問題中的時候，雖也主張作『革命的鬥爭』，但不僅沒有推翻，反而更證實了我下面這一句話：『舍米契同志並沒有完全了解布爾塞維克對於民族問題的基本主張』，因爲他不明白，民族問題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而是與革命勝利問題有密切聯系的，整個革命問題的一部分。

但我也並不想說，我關於舍米契同志在這一個問題中的錯誤所發表的意見是什麼的。

關於舍米契同志的錯誤，曼奴依爾斯基同志在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上就已說過，曼奴依爾斯基同志說：

『舍米契同志在他所著的馬克斯主義中之民族問題一書上以及他在南斯拉夫共產黨機關報上所發表的許多文章中，把修改憲法的口號當作了共產黨的實際口號，這就是他實際上把民族自決問題全部歸到憲法的範圍中去說了。』（參看第五次大會記錄五九六頁）

季諾維埃夫同志在南斯拉夫的委員會上也說到了這個錯誤，他說：

『在舍米契同志的遠景中所缺少的只是革命這件東西，要知道，民族問題是革命的
問題而不是憲法的問題』（參看真理報第八三期）

俄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中的這些代表們關於舍米契同志的錯誤所講的話，當然決不會是偶然的，毫無根據的。無風是不會起浪的。

舍米契同志的第一個錯誤是這麼一回事。

他的其餘錯誤直接是從這個基本的錯誤中產生出來的。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在我的講演中（參看布爾塞維克雜誌第七期）已經說過，舍米契同志『不願意把民族問題在實際上看作是農民問題』。

這對不對呢？

請你把舍米契同志在南斯拉夫委員會上所說的下面一段話讀一下，而且請你自己去判斷罷。

舍米契同志問道：『南斯拉夫的民族運動之社會意義是什麼呢？』他自己回答道：『這個社會的實質就在於塞爾維亞的資本與克羅阿脫及斯拉夫的資本之間的競爭』（參看舍米契同志在南斯拉夫委員會上的演說）

當然，斯拉夫族和克羅阿脫族的資產階級與塞爾維亞資產階級間的競爭這種民族運動中也能起相當的作用——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把各個民族的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看作民族運動之社會實質的這樣人，就不會把民族問題在實際上看作是農民問題——這也是一樣的毫無疑義的。現在，民族問題已從地方的國家內部的問題變成了世界的問題，變成了殖民地與附屬國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問題，這時候民族問題的實質是什麼呢？現在民族問題的實質就在於殖民地與附屬國反抗統治民族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對於他們的財政剝削，政治壓迫，以及文化掠奪的鬥爭。在這一民族問題的提法之下，各種不同民族的資產階級相互間競爭，能有何種意義呢？這種意義，當然不是最主要的，有的時候甚至是無關緊要的。很明顯的。這裏主要的並不是在於這一個民族的資產階級能在競爭中把另一個民族的資產階級打倒的問題，這裏的問題是在於佔統治地位的帝國主義者剝削和壓迫殖民地及被壓迫民族的基本羣衆（首先是農民羣衆）而這種剝削和壓迫，同時又引起了這些羣衆與帝國

主義鬥爭，使他們成爲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者。如果民族運動的社會實質是在於各種不同民族的資產階級間的競爭，那末也就不能把民族問題在實際上看作是農民問題，反過來說，如果你把民族問題，在實際上看作是農民問題，那麼，你就不能把各種不同民族的資產階級間底競爭當作民族運動的社會實質。要在這兩個公式之間劃一個等號，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

舍米契同志也引證了史大林在一九一二年年底所著的馬克斯主義與民族問題那本書中的一句話。那句話是這樣說的：「民族的鬥爭就是資產階級間相互的鬥爭」。他之所以引證這句話，就是想藉此來證明，他對於現時民族運動之社會實際所下的定義之正確。但這本書是在大戰前著的，那時候民族問題在馬克斯主義者看來還不是一個全世界的問題，那時候馬克斯主義者所提出來的民族自決的基本要求，還沒有當作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當成了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一部分。如果直到現在還沒有看到國際的形勢已起了根本的變動，歐戰和俄國的十月革命已把民族問題從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一部分變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那就未免太可笑了。一九一六年十月，列寧在他自己著的民族自決問題討論之總結一書中就已說過：民族問題的基本點——民族自決問題，現在已不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它已變成整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列寧以及俄國共產主義的其他的代表關於民主問題還發表了許多深遠的著作，我在這裏也不多講了。現在，當

我們已由新的歷史環境而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時候，舍米契同志却徧來引證史大林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所著的那本書中的一句話，究竟有什麼意義呢？這意義僅僅是這樣：舍米契同志的引證是完全離開了空間與時間，不顧到在某一個歷史環境中正確的話，在另一個歷史環境中是可以變成不正確的。我在南斯拉夫委員會上的講演中已經說過，俄國布爾塞維克的民族問題底提法有兩個階段，第一個是十月革命前的階段，這時候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期，民族問題還是當作整個民主運動的一部分，第二個是十月革命的階段，這時候已經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民族問題也已變成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這個區別有非常重大的意義，這是用不到再加以證明的。我恐怕舍米契同志還沒有明白這兩個階段間的這種區別的意義！

因此我認爲舍米契同志不願把民族問題在實際上看作農民問題，而要把他看作是各種不同民族資產階級間之競爭的問題，是由於『忽視民族運動底力量和不了解民族之深刻的，民衆的，革命性質』所致。

舍米契同志的第二個錯誤就是這麼一回事。

季諾維埃夫同志在南斯拉夫委員會上也同樣的說到了舍米契同志的這個錯誤，這是很可注意的，季諾維埃夫說道：

『舍米契同志說南斯拉夫的農民運動是資產階級所領導的，因此不是革命運動，這

種說法是不對的』。

這種異口同聲的說法，是不是偶然的呢？當然不是的。

又是無風不會起浪的。

最後，關於第三個問題，我也已經說過，舍米契同志企圖『離開國際環境和歐洲的前途來觀察民族問題』。

這種說法對不對呢？

是的，這是對的。因為舍米契同志在他的說話中絲毫沒有講到國際環境在現時的情形之下，尤其是對於南斯拉夫，是解決民族問題事業上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南斯拉夫國家本身是帝國主義兩大集團間衝突的產物，南斯拉夫決不能逃出它周圍的帝國主義國家現時所要發生的那一場惡戰——這一切事實都是在舍米契同志的視線之外的。舍米契同志說他完全承認在國際環境相當的變動之後，民族自決問題能成爲迫切的實際問題，但這種說法，在現時的國際環境之下，已經是不充分了。現在的問題並不是在於承認在遙遠的將來國際環境能起相當變動，而使民族自決問題成爲迫切的實際問題，——這一點，在現在，就是那些資產階級的民主黨人，在必要的時候，也會承認的。現在的問題並不在於此，而是在於：不要使戰爭和暴力所造成的南斯拉夫現在疆界變成解決民族問題的出發點和立法根據，兩者之間必取其一：民族自決問題，及根本改變南斯拉夫疆界的問題，或者是描寫遙

遠的未來的那種民族綱領的招牌，或者是民族綱領的基礎。一般看來是很明顯的，民族自決這一條如果只是民族綱領的招牌，當然就決不能同時又說它是南斯拉夫共產黨民族綱領的基礎。我恐怕舍米契同志還照舊地把民族自決問題看作民族綱領的一種未來的招牌。

所以，我認爲舍米契同志完全把民族問題與整個的國際環境問題分裂開來，因此他把民族自決問題，即根本改變南斯拉夫疆界的問題，當作了一個學院式的不切實際的問題。

舍米契同志的第三個錯誤就是這麼一回事。

曼奴依爾斯基同志在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上的報告中，也同樣的講到了舍米契同志的這個錯誤。

「舍米契同志對民族問題的整個主張之基礎前提就是下面的這一個思想：無產階級應在許多戰爭和努力所造成的那種疆域中去奪取資產階級的國家。」這一種異口同聲的說法難道是偶然的麼？當然不是的。

再說一遍：無風是不會起浪的。

（此文登於布爾塞維克雜誌第一一·一二，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日。×注重點是我加的——史大林註。）

東方大學的政治任務

在東方大學學生會議上的演說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

同志們！首先允許我致敬禮於你們東方勞動大學成立的四週年紀念。我希望你們大學在很艱難的道路上培養東方共產主義幹部之種種成功，自不待言了。

再允許我道歉，雖然應該常來，我却很少到你們大學來。忙些甚麼？——事務多，沒有常來與你們見面的可能。

現在說到東方勞動大學政治任務問題。

若是分析東方勞動大學的成分，不能不注意這成分若干的兩重性；這個大學合共不下五十種民族的代表，算是東方人種的團體。大學的學生他們都是東方的兒子，但是這個定義還不算怎樣明顯與完善。事實上在大學學生的中間，有兩個主要的部份，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發展條件：

第一部份是從蘇維埃的東方來到此地的人，從資產階級的政權完全滅絕了，帝國主義的壓迫推翻了，而政權屬於工人的地方來的。

第二部份學生，是從殖民地來到此地的人。從資本主義仍統治一切，帝國主義的壓迫尚保留其全力，而還需取得獨立，驅逐帝國主義的這些地方來的。

因此擺在我們的面前有兩個東方處於相異的生活，且在不同的條件中發展。

這個學生成份的兩重性，在東方勞動大學的工作上，不能不有其印象。這正是說明這個大學一隻腳立在蘇維埃的上面，一隻腳立在殖民地上面。

因此，在大學的工作中，有兩條路線：一條路線是造就一羣有力的幹部，以應東方蘇維埃共和國的需要；而另一條路線是造就一羣有力的幹部，以應殖民地勞動羣衆革命的要求。

故由此產生兩種任務擺在東方勞動大學之前。

茲分別來考究東方大學的兩種任務：

東方大學對於東方蘇維埃共和國之任務：

這些共和國這些地方的發展與實現的特點，及其與殖民地的區別是什麼？

第一，這些共和國是解除了帝國主義的壓迫。

第二，他們的發展和鞏固不是在資產階級政府保護之下，而是在蘇維埃政權保護下的民族，這是在歷史上沒有比擬的事實，但這畢竟是事實。

第三，雖則他們在工業上是很不發達，他們却能在自己發展上完全依靠蘇聯工業無

產階級的幫助。

第四，這些共和國是從殖民地的壓迫解放出來的，處於無產階級專政保護之下并且是蘇聯的分子。他們有可能且應該加入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

主要的任務，是要使這些共和國的工人農民便於加入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按照這些共和國的各不相同的條件，創造並且發展各種有力的前提，推進加速這個聯合。

由此產生目前的任務，擺在東方蘇維埃積極工作份子的前面：

一，在東方蘇維埃共和國建立工業的熔爐，以作集合，農民在工人階級的週圍之基礎。你們知道這個事業已經開始，並且將依蘇聯經濟增長的程度而前進。在這些共和國有各種的原料，乃是這個事業與時俱進，直作到底的保證。

二，提高農村經濟，首先是灌溉；你們知道這個事業在高加索一帶，和土耳其司坦已在極力的進行，

三，提倡且推進農民和手工業者廣大羣衆的合作事業，爲東方蘇維埃共和國加入蘇維埃經濟建設共同統系之最可靠的方法。

四，使蘇維埃接近羣衆，使蘇維埃成爲民族的組合，因此而樹立民族蘇維埃的國家性，對於勞動羣衆很接近且瞭然。

五，發展民族的文化，廣設學校及講演班，普通教育的性質，與實業技術的性質，皆

如此去辦，用本地的語言爲的是從本地人中養成蘇維埃及黨的實業的經濟的幹部。實行這些任務——這當然是利於東方蘇維埃共和國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

說到東方蘇維埃模範共和國，那末什麼是模範共和國？模範共和國是切實真誠的實行所有這些任務的共和國，由他本身創造一個使鄰近殖民地工農趨向解放運動的引子。

我上面已說了，蘇維埃之接近民族的勞動羣衆——蘇維埃的民族化。然而這是什麼意思，他實際上的表現是怎樣的？我想這樣接近羣衆的模範，可以來考察，不久在土耳其斯坦才告完結底民族的劃界。資產階級的報紙對這種劃界，認爲是『布爾塞維克的詭詐』。然而很明顯的，此地所表現的不是『詭詐』而是土耳其墨尼士坦和烏慈伯其士坦民衆底極高度的願望，得由他各自的權力機關，很明瞭的接近他們，在革命以前的時代，這兩國均被分裂成爲諸可汗們（譯者按即韃靼諸王）的小小國家，以供一般『富有權力』剝削者的陰謀之漁利場。現在時候到了，顯然有了可能，將這些被分裂的小塊，再聯合成爲獨立的國家，爲的是使烏慈伯其士坦，與土耳其墨尼士坦的勞動羣衆與權力機關接近打成一片。土耳其其司坦的劃界主要的意義，是使這些國家分裂的部份，重新聯合成爲一個獨立的國家。若是這些國家因此願意以平等法權的資格加入蘇聯爲其會員，這不過說多數黨對於東方民衆的極高的傾向找到了鎖鑰，而蘇聯乃是在世界上各民族勞動羣衆唯一的自由意志的聯合。爲的要聯合波蘭，資產階級需用許許多多戰爭。爲得要聯合土耳其墨尼士坦和烏慈伯其士坦

共產黨人只需費幾個月工夫的說明宣傳。

這便是如何的必須使行政機關在蘇維埃某個機會中去與各民族的廣大勞動羣衆接近。這便是多數黨的民族政策。

我以後更講到在東方蘇維埃共和國民族文化提高。但是什麼是民族文化？如何將他與無產階級的文化聯合起來呢？列寧不是在戰前就說了嗎？我們有兩種文化——資產階級的和社會主義的，而民族文化的口號是資產階級底反動的口號，極力用民族主義口號的毒劑來麻醉一般勞動者覺悟？如何建設民族文化，以本地言語發展學校和講演班培養地方幹部會與社會主義的建設資產階級文化的建設相融洽呢？此地有沒有不可渡過的矛盾？當然是沒有！我們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這完全是真實的，但無產階級的文化其內容是社會主義的，在各種加入社會主義建設的人民，因語言，風俗等等的不同，而採取各種不同的形式和方法的表現，這也是真實的。他的內容，是無產階級的；他的形式，是民族的——這就是人類共同的文化，社會主義的所向。無產階級的文化是不廢棄民族的文化而給他以內容。反之民族的文化也不廢棄無產階級的文化而給他以形式。當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的時候，民族的鞏固是處於資產階級政府保護之下，民族文化的口號，乃是資產階級的口號。當無產階級握得政權的時候，民族的鞏固，是處於蘇維埃政權保護之下，民族文化的口號，乃是無產階級的口號。誰不明瞭這兩個不同的環境的主要區別，便永遠不會了解列寧主義

及列寧主義觀點的民族問題的眞象。

有人解說（如考茨基）在社會主義時代，廢除其他一切語言，創造一個人類共同的語言。我不大相信這個統一的包括一切的語言底理論，無論何處的經驗均不是擁護，而是反對這樣的理論。到現在事實是如此，社會主義革命並未減少，而增加了語言的數量，因爲他激動最下層的人類，並推動他們上政治舞台，喚醒許多新的民族，從前不出名或不大出名的走向新生活，誰會想到舊帝國代表不下五十種民族人種的團體。然而十月革命，破壞了舊的鎖鍊，而推動許多忘却了的人民和民族上舞台，給他們以新生活和新的發展。現在講印度好似是一個整個的；然而若是在印度革命激動起來的時候，毫無疑義的使十來種從前不出名的民族，各有各的語言文化的出現於舞台，若說到各種民族與無產階級的文化聯合，這是毫無疑義的，這個聯合將經過一些形式，按照各種的言語和風俗。

不久我會接了一些布列的同志的信，要求解釋人類共同文化與民族文化的相互關係的重要且困難的問題如次：

『懇求解釋下面各種對於我們非常重要且困難的問題：共產黨最終的目的，是唯一的人類共同文化。怎樣想由民族的文化在我們各自治共和國個別的地域內發展而到唯一人類共同的文化呢？怎樣應該使各民族的文化特性（語言等等）同化起來呢？』

我想上面說的就可以答覆布列的同志們所畀心的問題。

布列的同志們提出關於人類共同無產階級的文化建設的過程中，各民族同化的問題，自然有些民族會被捲入且一定無疑的被捲入同化的過程。這種的事，從前也是有的，但要緊的是一部份的民族的同化過程，並不屏除，反而預定了各種強大民族的鞏固和發展的反面過程，因為部份的同化過程，乃是民族發展總過程的結果，所以因此一部份民族能同化，是並不減弱，反而確定這個完全正確的見解，即無產階級的人類共同的文化，並不屏除，反而預想培養民族的文化。既然民族的文化並不屏除，反而補充豐富無產階級的人類共同的文化。

這乃是共同的目的任務，擺在東方蘇維埃共和國積極工作份子的前面。
這些任務的內容和性質便是如此。

必需利用強固經濟建設的進取時期，和對於農民新的讓與，以推進實現這些任務，然後便於使東方蘇維埃共和國這些全是農民的國家加入蘇聯建設社會主義。

說是黨對於農民的新政策給了一些新的讓與（短期地租，允許雇用勞動）本身包含一些讓步的成分，這對不對呢？是對的，但是這種讓步的成分，在黨和蘇維埃政權方面，給我們以莫大力量的保障。貨幣的穩定，工業的發展。運輸的發達，信用法的鞏固，藉此得發行定期公債，還是破壞抑是不發生一點驚動地將各層民衆提高到很高的程度，——所有這些均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手裏的後方力量，在他的基礎上面小部分戰線上一些讓步的成分

祇是有利於全部戰線上進攻的預備。所以黨允許給農民底一些新的讓與，必不會阻難，而在現在是有利有農民加入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

這種的景況，對於東方蘇維埃共和國會有什麼意義？祇有這樣的意義，他給這些共和國的積極工作份子以新的武器，便利；加速這些國家與蘇維埃經濟發展共同系統的聯合事業。

這乃是黨的政策，與東方蘇維埃積極工作份子目前任務的關係。

所以東方大學對於東方蘇維埃共和國的任務，乃是為這些共和國培養幹部在乎保證實現上面所說的目前任務。

東方大學是不能脫離實際生活，他不是且不能是一個超實際生活的學校，他應當以自身生存的根本來與實際生活緊接。因此他才不會拋棄東方蘇維埃共和國的目前任務。所以為什麼東方大學的任務是在注重這些共和國的目前任務，去為他們培養適當的幹部。

此處在東方蘇維埃積極工作份子的實例中，必須注意兩種傾向與之奮鬥；在這大學壁壘以內，必須為東方蘇維埃培養真實的幹部，和真實的革命者。

第一種傾向便是把我上面所說的這個責任簡單化了，希圖機械的移植經濟建設的模範，完全明白適應於蘇聯的中心，但是完全不合於所謂邊境地方發展的條件。同志們，犯這種傾向的人，不明白兩件事：他們還不懂得即東方諸蘇維埃共和國本身不是一種的，其中

有一些例如格魯齊亞和阿爾尼亞是高級的民族形成，其他如捷尺宜和加貝爾德是低級民族形成，另外其中第三者如其爾及斯坦又處於這兩端的中間地位。這些同志們不明白，若是不適應各地方的情形，不嚴密計算每個地方的所有一切的特性，是不能建設一點什麼實在的東西出來。這種傾向的結果，便是脫離羣衆而產生一般發左派論調的人來了。

第二種傾向是相反的，張揚各地方的特質，而忘記其全部的主要的即東方蘇維埃共和國與蘇聯各工業區的關係。不問社會主義的任務，去適應狹隘的民族主義的任務，犯這種傾向的同志們，是少注意本國內部的建設，他們情願讓這個發展自然的狀態去發展。對於他們重要的不是內部的建設，而是「對外」政策，擴張自己共和國疆界與環繞的各共和國爭論希圖奪得鄰國一小塊多餘的土地，因此以取悅於本國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東方大學的任務，乃是以不妥協的精神與這些隱匿未發的狹隘民族主義奮鬥中來培養幹部。

這乃是東方大學對於東方蘇維埃共和國的任務。

東方大學關於東方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的任務。

現在我們就講到第二個問題，即是東方勞動共產大學關於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的任務問題。

這些國家的生存和發展的特性，與東方的蘇維埃共和國不同之點是些甚麼？

第一，便是所有這些國家，都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生存和發展。

第二，便是受兩重的壓迫——內部的壓迫（本國的資產階級）與外部的壓迫，（外國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促進了這些國家裏面的革命危機。

第三，便是在這些國家中，有幾國如印度，其資本主義的發展速度非常之快，於是漸次逐漸發生了形成了多數的本地無產階級。

第四，便是因為有了革命運動的高漲，而這些國家裏面的本國資產階級，遂分化成爲兩部份，即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與妥協的，（大資產階級）從兩種當中，前者仍繼續其革命的爭鬥，而後者則實行與帝國主義聯合。

第五，便是在這些國家裏面而與帝國主義的聯合遙遙相對的，又形成了另一種聯合即是工人與小資產階級的聯合，即是以從帝國主義中全部解放出來爲目的的反帝國主義聯合。

第六，便是在這些國家裏面關於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和從妥協的本國資產階級的影響之下，把民衆解放出來的問題均愈見帶發揚的性質。

第七，便是這些景況，非常便利於這些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與西方先進國的無產階級運動的聯合。

由此至少可以得出下列三種結論：

一，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國家要達到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中解放出來，除了革命勝利是

不可能的，即是說無代價的獨立是得不着的。

二，要推進革命和取得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國家，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上全部的獨立，除了與本國的妥協資產階級隔離，除了把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從妥協的資產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除了無產階級出來作領導者，除了把工人階級中先進的份子組織在獨立的共產黨中，完全是是不可能的。

三，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中，要達到堅固的勝利，如果他們的解放運動與西方先進國的無產階級運動二者之間沒有實際的聯合，亦是是不可能的。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共產黨人的根本責任，就是從這些結論中去找出自己革命工作的出路。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與這些情景相關連的革命運動的目的責任是些什麼呢？

現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特質，就其本質上來說完全已非一致的和籠統的殖民地的東方了。在以前殖民地的東方彷彿差不多是表現一致的和同樣的，然而現在這樣現象，已經不合於實際了，現在我們至少有三種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第一，如摩洛哥一類的國家，沒有或者差不多沒有自己的無產階級，在實際上完全沒有發展。第二，是中國和埃及一類國家，在實際上尚少發展，比較上已經有了少數的無產階級。第三，是印度一類的國家，資本主義多少已經是發展，而且多少有了多數的本國無產階級。

很明顯的，一點不能夠把所有這些國家相提并論。

對於摩洛哥這類的國家，他本國資產階級還無所謂分化成革命的與妥協的政黨的根據，共產主義份子的任務便是採用一切手段，造成反對帝國主義的統一民族戰線。在這些國家裏面，共產主義要劃分成單獨的政黨，只有是在同帝國主義奮鬥的進程中，特別是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戰事勝利之後，才能夠產生出來。

對於埃及或中國一類國家，那裏的本國資產階級已經分化成革命的妥協的政黨，但是妥協的一部份資產階級還不能與帝國主義聯成一氣，而共產黨人又已經不能把自己完全當作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民族戰線的組織，因此在這些國家裏面，共產黨人應該從統一民族戰線的政策，轉到工人與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合政策，這種聯合可以採用『國民黨』一類的如工農黨，統一黨的形式，然而在實質上須使這種特質的黨代表兩種力量的聯合，即共產黨與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政黨的聯合，揭破本國資產階級的半途不前的和不澈底的性質而與帝國主義堅決奮鬥，就是這種聯合的責任。這種兩重性的政黨，如果他牽掣共產黨的手足，不妨害共產黨煽動和宣傳工作的自由，不阻礙無產階級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而又使共產黨這方面便於作事實上領導革命運動的事，那末這種政黨是需要的，而且是便宜的，假如牠不能保證所有這種種的條件，那末這種兩重性的政黨就用不着，而且也不合宜。因為牠適足以引起共產主義份子同化於資產階級的行列，而使共產黨失去了無產階級的軍

隊。

至對於印度這一類的國家，事實的進行就稍有些不同。如印度這樣殖民地的生存條件，其根本的和新的條件不僅僅是本國的資產階級已經分化，成了革命的與妥協的政黨，而且首先這一部份妥協的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的協定根本已經成功了。他們怕革命比怕帝國主義還利害，他們痛心自己的財貨的利益，比痛心自己祖國的利益更甚，這一部份的資產階級是最有錢的，而且是最有勢力的，雙足站在與革命不可調和的仇敵的營壘上的，與帝國主義聯成一氣，反對自己本國的工農，不打破這種聯合，是絕不會得到革命的勝利的，然而要打破這種聯合，就須集中射擊，反對妥協的本國資產階級，揭破他們內奸的行爲，從他們的影響之下，把勞動羣衆解放出來而且有系統的爲無產階級準備作領導的必需條件。換句話說，就是在印度這樣的殖民地中，準備無產階級去當解放運動的首領的作用，一步跟一步的把資產階級及其通敵者從尊貴的地位推下來，造成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聯合，而且在這種聯合中保證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這就是他們的責任，然這種聯合不應該採取工農黨統一的形式，在形式上被統一的綱領所束縛，在這種國家裏面共產黨的獨立性應該是共產主義先進分子的基本口號，因爲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只有共產黨才能够準備和指導，然而共產黨爲得在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去分離妥協的本國資產階級，與夫引導城市和鄉村數十百萬的小資產階級羣衆隨着自己走，他儘可以而且應該加入公開的聯合，與資

產階級的革命派合作。

由此我們便可以看出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的革命運動的目前任務應該是：

一，奪取工人階級最好的份子到共產主義這方面來，創立獨立的共產黨。

二，創造工人農人和革命的智識階級的民族革命的聯合，以反對妥協的本國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的聯合。

三，在這種聯合當中要保證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

四，從妥協的本國資產階級影響之下，作解放城市 and 鄉村的小資產階級的奮鬥。

五，保證解放運動與先進國無產階級運動的聯合，這就是擺在東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努力工作者的面前之三種目前責任。

假如我們就近時國際的情形來研究這些責任，他們都是可以發現出特別嚴重的性質，和特別重大的意義，在現時國際的情形，覺得是表現革命運動暫時的沉寂的時期到了。然而究竟什麼是沉寂，在現時這種沉寂能夠表示出什麼意義呢？可以說他的表示只是加厲地壓迫西方的工人，和東方的殖民地，而首先便是對付各國革命運動的旗手蘇聯，在帝國主義者的行列中，這種壓迫蘇聯的準備已經開始了，這是毫無疑義的，關係于愛斯多尼亞暴動的毀謗運動，關於索菲亞炸案的蘇聯的詭計陷害，資產階級的報紙一致向蘇聯進攻，所

有這些都是向我們進攻的預備的階段。這是輿論的炮兵預備，計算藉此培養那些居民來猛烈攻擊蘇聯，且造成一些精神上的前進，以圖侵犯，這些欺騙奸詐的運動，結果如何呢？帝國主義者或許冒險企圖猛力進攻一點，也不足以約束那些殖民地，在這一點上我想很明顯的沒有什麼可疑的根據。因此關於聯合革命勢力，準備反攻帝國主義方面似是而非的打擊，這個問題，就是現時必不可免的問題。

所以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履行這種革命運動的目前任務有所不當，對於現時就會發生特別重大的意義。

東方大學關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與所有這些狀況的關係所負的使命是什麼呢？這種使命就是精確計算這些國家革命發展所有的特點，從保證履行以上所解釋的各個不同的目前責任，從這方面去培養這些地方來的幹部。

在東方大學裏面，大約聽講者有十種民族班，他們都是從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走到我們這裏來的。大家都知道這些同志都渴望得着教育和智識，因此東方大學的責任，便是從他們當中訓練出真正的革命家，以列寧主義的理論來武裝他們，以列寧主義的實際經驗來供給他們，使他們能够心甘意悅的毫無畏懼的去完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解放運動的目前任務。

關於這點，在殖民地的東方的積極工作者的實際工作中，就必須有兩種傾向的發現，

因此爲得培養真正的革命幹部，所以對於這種偏向的奮鬥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種傾向，就是在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國家裏面沒有估量到解放運動之革命的可能性，與夫太過重視單一的總攬的民族戰線的觀念，不問這些國家的組織和發展的程度，這種是右派的傾向，包含有減低革命運動和共產主義份子同化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的一般聲調中去的危險，堅決的同這種傾向奮鬥，就是東方大學直接的責任。

第二種傾向，就是對於解放運動之革命的可能性估量太過，和沒有估量到工人階級與革命的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這種事實。爪哇的共產黨人恰好就犯了這種傾向，不久以前，他們對於本國曾經很錯誤的提出蘇維埃政權的口號，這是左派的傾向，包含與廣大羣衆隔離和把共產黨變成宗派的危險。堅決與這種傾向奮鬥，就是爲東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培養真正的幹部之必需條件。

普通說，這是東方大學關於蘇維埃與殖民地的東方人民的政治責任。

我們希望東方大學很體面的能够去執行這些責任。

問題的提法

民族有權自由的去決定自己的命運。他有權隨自己的方便去組織起來，當然自不能蹂

躡其他民族的權利，這是無可爭辯的。

但是，他應當怎樣組織起來？如果注意到民族中多數人的利益，而且首先是無產階級的利益，那末，他的將來的憲法應當採取怎樣的方式？

民族有權自主的組織起來。他甚致有權分立起來。但是，這還不是說，無論在任何條件之下，他都應該這樣做去，這也不是說，自主或分立隨時隨地都有利於民族，即有利於民族中的多數人，即有利於勞動階層。外高加索韃靼民族可以召集自己的國會，服從自己的大佐和大師的影響，恢復其舊制度，決定由國家中分立出來。按照民族自決這個條文的意思，他們有充分的權利去幹這些事體。但是：這是否有利於韃靼民族的勞動階層呢？社會民主黨對於大佐大師如何引導羣衆去解決問題能否漠不關心呢？社會民主黨是否應該過問事情而且在一定的方式中去影響民族的意志呢？他是否應該提出解決問題的具體計劃，即對於韃靼羣衆最有利利益的計劃呢？

但是，如何解決問題是最能適合勞動羣衆的利益呢？是自主呢，還是聯邦呢，抑或分立呢？

所有這些問題，都要看該民族所處的具體歷史條件來解決的。

不僅如此。條件亦如一切事物一樣，是變化的，對於目前是正確的解決，而在另一個時候，可爲完全不能接受的。

在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贊成俄屬波蘭的分立，而他的主張是對的，因為當時的問題是把高級文化從破壞他的低級文化中解放出來。而且當時的問題，不僅是理論問題，不是學院式的問題，而是實際問題，生活本身的問題。

在十九世紀末葉，波蘭的馬克思主義者已經表示反對波蘭的分立，而他們的主張也是對的，因為在最後五十年間，發生了種種深刻的變化，使俄羅斯和波蘭在經濟上和文化上接近起來，此外，在這個時期，分立問題已從實際行動的對象，變成了只對國外智識分子才有興趣的學院式的爭論對象了。當然，這並沒有除去那使分立問題可以重新提到議事日程上的某些內外局面的可能性。

從這裏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民族問題的解決，祇有在與歷史條件（從他們的發展中來看）的聯繫中，才有可能。

某個民族所處的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條件，就是解決某個民族應如何組織起來，他的將來的憲法應取何種形式的問題之唯一的鎖鑰。在這裏有一個可能，就是對於每個民族需要特殊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如果某處需要用辯證法來提出問題的話，那末，這恰恰就在此地，就是在民族問題上。

爲此之故，我們應當堅決的起來反對一個極普遍而極空洞的『解決』民族問題的方法

，這個方法是猶太工人同盟所提出的。我們可以說，這是輕易的援引奧地利亞或南斯拉夫社會民主黨（南斯拉夫社會民主黨曾在過去的奧地利亞南部做過工作）的一個方法；他們認為該社會民主黨已經解決了民族問題，而俄國社會民主派應當簡單的做效他的解決法。同時，他們認為，凡對於奧地利亞是正確的東西，對於俄羅斯也是正確的。他們忽略了最重要的和此地有決定一切的事情，即：在一般俄羅斯和在俄羅斯內部每個民族生活中具體的歷史條件。

舉例來說。請聽聽有名的猶太工人同盟派科梭夫斯基的話：

『當猶太工人同盟第四次代表大會上討論了問題的民族方面（指民族問題言——斯大林）的時候，大會上一個代表提議根據南斯拉夫社會民主黨的決議精神來解決問題，他所提出的解決法得了全場的贊成』。結果『代表大會一致通過了……民族自主』。（科梭夫斯基。民族問題一六一——一七頁一九〇七年版）

再沒有別的！既不分析俄國的實際情形，也不說明俄國猶太人的生活條件：始則做效了南斯拉夫社會民主黨的解決法，然後『贊成了』，及後『一致通過了』！猶太工人同盟派如此提出和『解決』俄國民族問題……

然而，奧地利亞和俄羅斯却有完全不同的條件。惟其如此，奧地利亞社會民主黨在魯尼（一八九九年）所通過的民族綱領，是根據南斯拉夫社會民主黨的決議精神的（不錯

，加上了一些更改），該黨可以說完全不照俄國的方法去提出問題，當然，也不照俄國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首先拿問題的提法來說。民族自主的奧地利亞理論家，不魯尼民族綱領和南斯拉夫社會民主黨決議的解釋者——希普林格和鮑威爾如何提出問題呢？

希普林格說：

「此地我們不回答如下的問題：多民族的國家一般的是否可能以及奧地利亞諸民族是否非組成而為一個政治的整體不可；我們認為這些問題已經解決了。凡不同意上述的可能性與必然性的人，當然要把我們的研究看作是無根據的。我們的立論是：某些民族不能不謀共同的生存；那些法權形式將給他們過最好的生活可能呢？」（見民族問題一四頁，着重點是希普林格加的）

鮑威爾也說過同樣的話：

「我們從下列一個假定做出發點：奧地利亞諸民族將仍舊保留於他們現在所處的那個國家聯盟之內，試問在這個聯盟的範圍內，各民族間的關係以及一切這些民族對於國家的關係究竟怎樣呢？」（見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主義，三三九頁）

又是；奧地利亞的完整性乃為第一個義務。

俄國社會民主黨能否這樣提出問題呢？不，不能。他所以不能這樣提出問題的緣故，

就因爲他自始就站在民族自決的觀點上，根據這個觀點，民族也有權分立。甚至猶太工人同盟派哥爾伯拉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也承認過，俄國社會民主黨不能放棄民族自決的觀點。要聽哥爾伯拉當時所說的話：

『我們絕對不能反對民族自決。如果某個民族爲他的獨立而鬥爭，那末我們就不能反對這個鬥爭。如果波蘭不願意和俄羅斯結成「正式的婚姻」那末我們就不應該妨礙他。』

所有這些都是不錯的。但是，從這裏要得出一個結論：奧地利亞社會民主派和俄國社會民主派的出發點，不但不相同，而且恰恰相反。自此以後，能否說俄國人可以倣效奧地利亞人的民族綱領呢？

次之。奧地利亞人認爲民族自由可以用小的改良，用緩的步驟，實現起來。當他們提出民族自主作爲實行的辦法時，他們並沒有注意到將來的根本改變，將來的民主解放運動。然而，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却把『民族自由』問題與或然的根本改變，與民主解放運動聯繫起來，他們沒有理由去作改良的打算。這對於——俄國各民族或然的命運就有重大的改變了。

鮑威爾說：

『不錯，很難說，民族自主是偉大解決之結果，是勇敢堅決行動之結果。奧地利

亞將一步一步的走到民族自由，這將是緩慢的和痛苦的過程，這將是嚴重的鬥爭，由於這種鬥爭，立法行政將陷於無用的狀態，不，新的國家法權制度，不是用偉大的立法行為，而是由許多爲個別區域爲個別地方所頒佈的法律創造起來。」（見鮑威爾的民族問題，四二二頁。）

希普林格也說過同樣的話，他寫着：

「我知道很清楚，這類的機關（民族自主的機關，——斯大林），不是一年創造起來，也不是十年創造起來。僅僅改組一個普魯士行政機關，就化費了很長的時間……爲徹底建立他的基本的各行政機關普魯士不能不化費了二十年的時間。因此，讓人們不要想，以爲我不知道奧地利亞要化費多少時間，要經過多少困難。」（見希普林格的民族問題，二八一至二八二頁）

所有這樣都是十分肯定的。但是，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能否不把民族問題與「勇敢堅決的行動」聯繫起來嗎？他們能否打算到局部的改良，打算到「許多個別的法律」，打算到把他們看作是獲得「民族自由」的工具嗎？如果他們不能夠和不應該這樣做，那末，奧地利亞人和俄國人的鬥爭方法前途。是完全不同的，難道從此不是很明白的嗎？在這種情形之下，如何可以只限於奧地利亞人的單純的半途的民族自主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贊成做效的人們沒有打算到「堅決勇敢的行動」，或者是他們打算到這一點，但是他們「不

知自己做的什麼」。

最後，俄羅斯和奧地利亞各有完全不同的當前任務，唯其如此，解決民族問題的方法也因之而有所差異。奧地利亞處於國會制度的條件之下，這裏非有國會便不能發展。但是，奧地利亞的國會生活與立法機關，由於各民族政黨之劇烈的衝突，往往完全停頓起來。這也可以說明爲什麼奧地利亞老早就受到定期的危機。唯其如此，民族問題便構成奧地利亞政治生活的樞紐，成爲他的生存問題。因此，奧國社會民主派政治上首先努力去解決民族衝突問題，當然，他們是在已有的國會制度的基礎上，是用國會的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這是毫不奇怪的。

俄羅斯的情形不是這樣，在俄羅斯，第一，沒有國會。第二，俄羅斯政治生活的樞紐不是民族問題，而是土地問題。因此，俄國問題的命運，也就是說，『民族解放』的命運，是與土地問題的解決，與農奴制度殘餘的消滅，亦即與全國民主化，有連帶關係。這也可以說明，爲甚麼在俄羅斯民族問題不是獨立的和決定一切的問題，而是解放全國的一般的和更重要的民族之一部分。

希普林格說：

『奧地利亞國會之毫無結果，無非因爲每個改良都產生出各民族政黨內部的矛盾，這些矛盾破壞他們的團結，因此，各黨的領袖避免由改良所感受的一切事情。一般

的說，奧地利的進步，只有在各民族得到堅固的法權地位的情形之下，纔有可能。這可以使他們無須在國會中養育常備作戰的隊伍，而且給他們一種可能去注意經濟任務和社會任務的解決。」（見希普林格的民族問題，三六頁）

鮑威爾也說過同樣的話：

『民族和首先國家所需要的。爲了最愚蠢的語言問題，爲了在某個民族邊界上的醒覺人們之最小的吵鬧，爲了每個新的學校，致使立法機關停止工作，這是國家所完全不能容忍的。』（見鮑威爾的民族問題，四〇一頁）

所有這些都是很明白的。但是，在俄羅斯，民族問題處於完全不同的地位，這也是同樣明白的。不是民族問題，而是土地問題決定俄羅斯進步的命運，而民族問題，是附屬問題。

於是，就有不同的問題提出，不同的前途和鬥爭方法，不同的當前任務，——在這種實際情形之下，只有在空中和空間與時間以外去『解決』民族問題的紙人，纔能採用奧地利的例子而從事於做效它的綱領，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重說一遍：具體歷史條件就是出發點。辯證法的提出問題就是唯一正確的提法，——解決民族問題的鎖鑰就是這樣。

民族自主

上面我們已經說過奧國民族綱領的形式方面，說過方法論的根據，由於這些根據，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不能簡單的採用奧國社會民主黨的例子，而把它的綱領變成自己的綱領。現在我們在實際上來談它的綱領的本身。

於是，奧國社會民主派的民族綱領是怎樣呢？

一言而蔽之，它是民族自主。

第一，這就是說，自主不是那些以捷克人或波蘭人爲其主要居民的捷克或波蘭，而是給一般捷克人和波蘭人，不分領土，不管他們居住於奧地利亞任何地方，都是一樣。

因此，這種自主，稱爲民族自主而不是地方自主。

第二，這就是說，散處於奧地利亞各地的捷克人，波蘭人，德意志人等等（取其個人而言），組成而爲整個的民族，而這些整個民族，成爲奧地利亞國家之組成部份。在這種情形之下，奧地利亞將不是自主區域的聯盟，而是那些不分領土而形成的自主民族的聯盟。

第三，這就是說，全民的機關，即爲了這些目的而應當爲波蘭人、捷克人等等而建立起來的全民機關，將不是處理『政治』問題，而祇是處理『文化』問題。特別的政治問題

，集中於全奧地利亞的國會中。

因此，這種自主又稱爲文化自主，民族文化自主。

請看一八九九年奧國社會民主黨在不魯尼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綱領原文（南斯拉夫社會民主黨的代表也表決贊成這個綱領）。

該綱領說：『奧國民族分離，障礙政治的進步』，『民族問題之澈底解決，首先是文化上的必要』，『只有按照全民的，普及的，與平等的選舉權而建立起來的真正民主社會之下，問題才有解決的可能』。說了這些話以後，該綱領繼續說道：

『奧地利亞諸民衆的民族特性之保存與發達，祇有在完全平權與沒有任何壓迫之下，才有可能。因此，官僚主義的國家集中制之系統，以及個別地方之封建特權，首先應當推倒。

在此等條件之下，也祇有在此等條件之下，奧地利亞才能够在下列基礎之上建立民族秩序，以代替民族紛爭，這些基礎正是：

一、奧地利亞應當改造而爲各族之民主聯盟的國家。

二、應當建立民族分離的自治的團體，以代替歷史上王朝的領地，在某個團體中，立法行政都操在那些按照全民的、直接的、以及平等的投票所選出的民族國會的手中。

三、同一民族的各自治區域共組成而為民族統一的聯盟，該聯盟完全民主的解決自己本民族的問題。

四、少數民族的權利得由帝國會議所頒佈的特殊法律保障之。」

該綱領以號召奧地利亞一切民族共同工作作結束。

不難指出，在這個綱領中，還保留一些『地方主義』的痕跡，但是一般的說，這個綱領是民族自主的公式。難怪民族自主第一個鼓動家希普林格狂喜的歡迎這個綱領（見他的民族問題，二八六頁）。鮑威爾也贊成這個綱領，而稱它為民族自主之『理論上的勝利』（見他的民族問題，五四九頁）：祇是為着更加清楚起見，鮑威爾才提議把第四條改為更確定的公式，則必須把『每個自治區域內的少數民族組成為公共法人團體』，以處理學校事件及其他文化事件。（見鮑威爾的民族問題，五五六頁）

奧國社會民主黨的民族綱領如此。

試研究該綱領的科學根據。

現在我們來看，奧國社會民主黨如何闡明它所鼓吹的民族自主之根據。

試拿民族自主的理論家希普林格和鮑威爾來說。

民族自主的出發點，就是把民族了解為不以一定領土為轉移的人們之聯盟。

希普林格說：

『民族與領土沒有任何重要的聯系；民族是自主的個人聯盟。』（見希普林格的民族問題七四頁）

鮑威爾也說：

『民族是個人的集體』，它『不能在某個一定的區域中得到特有的支配。』（見民族問題一九頁）

但是，構成一個民族的人們，不是時常都是一個團聚稠密的羣衆，他們往往分散而爲各羣，而且在這個形式中寄居於他們民族的機體中。這因爲資本主義把他們驅逐到各地方去，到城市中去謀生。但是，這些羣衆一經走入其他民族的區域中且在那些地方成爲少數民族的時候，他們便忍受着當地多數民族的排擠，即語言，學校等等之受排擠。由此產生民族的衝突。由此，領土自主是『不適宜的』。據希普林格和鮑威爾的意見，要避免這種情形，唯一的出路，就是把散居於一國家內各地方的某個民族的少數，組織成爲一個共同的各階級間的民族聯盟。據他們倆的意見，只有這樣的聯盟，纔能保護少數民族的文化利益，只有這樣的聯盟，纔能消弭民族糾紛。

希普林格說：

『必須使各民族有正確的組織，使其能享受各種權利與義務。』（見民族問題二八六頁）當然，『立法是很容易的，但是，法律能否發生如人們對他所希望的效力呢

？」……『如果人們想替一個民族立法，那末，首先就要創造民族本身。』（同上五五二頁）……『不創造民族，便不能造成民族權利，亦不能排除民族糾紛。』（同上八八——八九頁）

鮑威爾的言論也是這樣，同時他主張『把少數民族組成爲基於個人原則之上的公共法人團體』，他認爲這是『工人階級的要求』。（同上八九頁）

但是，怎樣去組織民族？怎樣去決定何人屬於何種民族？

希普林格說：

『人之屬於何種民族，是由於民族名冊來決定的，凡居住於一地之人，都應當聲明自己是屬於何種民族。』（見普氏的民族問題二二六頁）

鮑威爾說：

『個人原則認定，居民之分爲民族，……是根據成年公民之自由聲明爲標準。』爲此之故，『應當準備好民族名冊。』（鮑氏的民族問題三六八頁）

其次，鮑威爾說：

『在清一色的民族各區中的一切德意志人，然後，填具了雙區的民族名冊的一切德意志人，構成德意志民族和選舉民族會。』（同上，三七五頁）
捷克人，波蘭人等等，也是如此。

希普林格說：

「民族會就是文化上的民族國會，凡爲維護民族學校事業、民族文化、藝術、科學，凡爲建設研究院、博物館、陳列室、戲院等等所必需的基礎之規定與經費之批准，都屬於這個國會。」（民族問題，二三四頁）

民族組織及其中央機關，就是這樣。

據鮑威爾的意見，當奧國社會民主黨創造出這樣的各階級間的組織時，它又設法「把民族文化變成爲……全民的福利，而且只有這樣，纔能團結民族的一切組成分子而爲民族文化的集體。」（民族問題，五五三頁。）

有人可以這樣想，以爲凡此一切只是指奧地利亞而言的。但是，鮑威爾不同意這一點。他堅決的斷言，凡在如奧地利亞一樣由幾個民族所組成的其他各國裏，也必定要實行民族自主。

據鮑威爾的意見：「一切民族的無產階級要把自己的民族自主要求，和有產階級的民族政策，和奪取多數民族國家中的政權的政策，對立起來」（同上，三三七頁）

然後，他暗地裏把民族自主去代替民族自決，他繼續說：「於是，民族自主，民族自決。不可免的成爲處於多數民族國家中的一切民族的無產階級之立憲綱領。」（同上，三三三頁）

但是，他還更進一步。他深信他和希普林格所「創造的」各階級間的「民族聯盟」，可為將來社會主義社會之模型。因為他認為：『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將人類分為民族分離的社會』（同上，五五五頁），在社會主義之下『人類將分成爲自主的民族社會』（同上，五五六頁），『於是乎，社會主義社會，無疑的，將是一幅個人的民族聯盟和地方集團之複雜的畫圖。』（同上五四三頁），因此『社會主義的民族原則，就是民族原則和民族自主之最高總合。』（同上五四二頁）

似乎够了吧……

在鮑威爾希普林格二人著作中的民族自主之根據如此。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拿民族自主去代替民族自決，這是完全令人不解，而且絲毫沒有理由的。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鮑威爾不懂民族自決，不然就是他懂了，但是不知他爲什麼有意把民族自決的範圍縮小了。因爲，無疑的：（一）民族自主須有多數民族國家之完整，而民族自決却超出這種完整的範圍之外；（二）民族自決把全部的權利交給民族，而民族自主只給它以『文化』權利。這是第一點。

第二，將來完全可有內外環境這樣的結合，在這種結合的情形之下，某個民族決定要脫離多數民族國家，如奧地利亞就是，同時露西社會民主派已經在不魯尼黨大會上聲明過

，他們決定把自己國民的『兩部分』聯合而爲一個整體，試問那時候『對於一切民族的無產階級所不可避免的』民族自主又將如何？

機械的把民族束縛於國家完整的範圍中，這不是問題的『解決』。

其次，民族自主又與民族發展的整個行程相矛盾。民族自主提出組織各民族的口號，但是，如果實際生活，經濟發展，把整羣整羣的人脫離這些民族，而散處於各地方，試問能否把他們勉強團結起來？毫無疑義的，在資本主義之最初各階段中，諸民族是團結起來的，但是，在資本主義最高各階段中，便開始各民族分離的行程，許多人羣都脫離這些民族的行程，這些人羣始則出去謀生，再則完全遷居於一國的其他區域，而這些已經遷居的人們，便失掉舊有的聯系，在新的地方發生的聯系，一代一代的過慣新的習尚與嗜好，也許又要操一種新的語言，這也是毫無疑義的。現在試問：能否把這些彼此互相隔離的人羣統一而爲一個民族聯盟呢？何處可以找到一些神奇的圈套，使不可統一的東西都能統一起來呢？例如能否把波羅的海沿岸和外高加索一帶的德意志人『團結而爲一個民族』呢？但是，如果凡此一切都是可能的，那末，在這種情形之下，試問民族自主與那些致力於使歷史車輪向後開的老民族主義者之空想又有什麼區別呢？

但是，民族之聯繫與統一，不僅由於分區而崩潰。民族統一的崩潰，又由於內部的關係，由於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在資本主義的最初各階段中，還可以說到無產階級與資產階

級之「共同文化」。但是，隨着大工業的發展和階級鬥爭的尖銳，這個「共同性」便開始瓦解。當同一民族的資本家和工人彼此語言已經不通的時候，那就不能鄭重的說到民族的「共同文化」。當資產階級渴望戰爭，而無產階級則「對戰爭宣戰」的時候，試問還有什麼「共同命運」可言呢？能否把從這些相反的分分子去組織一個各階級間的民族聯盟呢？自此以後，能否說到「團結民族的一切組成分子而為民族文化的集體」呢（見鮑威爾的民族問題五五三頁）？從這裏可以看出，民族自主與階級鬥爭的整個行程相矛盾，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但是，我們暫時假定，「組織民族」的口號，是可以實現的口號。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國會議員，努力去「組織」民族，以獲得多餘的票數，這還可以了解的。但是，從何時起社會民主派開始去幹「組織」民族，「構成」民族，「創造」民族等等的勾當呢？

在階級鬥爭最尖銳的時代去組織各階級間的聯盟之社會民主派，究竟是什麼樣的社會民主派呢？直到現在，奧國社會民主黨和其他各國的社會民主黨，只有一個任務：組織無產階級。但是，這個任務大概是「陳舊了」，現在希普林格和鮑威爾「抱定新的」更忙的任務：「創造」民族，「組織」民族。

然而，邏輯不能不如此：凡採納民族自主的人，應當又要採納這個「新的」任務，但是，採納這個任務，便是離開階級立場，走到民族主義路上……

希普林格和鮑威爾的民族自主，就是一種精鍊的民族主義。

同時，奧國社會民主派的民族綱領認為必須留意於『各個國民的民族特性之保存與發展』，這也完全不是偶然的。不過要想一想：試『保存』外高加索的韃靼人的這些『民族特性』——每逢『夏西·瓦西』紀念節他們就自己毆打自己吧！試『發展』佐治亞人的這些民族特性——人人有『復仇權利』吧！

上述這條文，只能列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綱領中，如果它也載在奧國社會民主派的綱領中，那末，只因爲民族自主容忍這些條文，與它沒有矛盾。

但是，對於現在不適用的民族自主，而對於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要更不適用。

鮑威爾於『人類分成爲民族隔離的社會』之預言，被現代人類發展的整個行程所推翻。民族的界限不是鞏固着，而是破壞着，崩潰着。還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已經說過：『民族的孤立與各種人民利益的背馳，就在目前已經日益消滅。』：又說：『無產階級的統治更要加速它們的消滅』。人類之往前發展及其資本主義生產之莫大的進步，及其民族之變更，與人們之統一於日益擴大的領土上，都完全證實了馬克思的思想。

鮑威爾想把社會主義社會看作是『一幅個人的民族聯盟和領土上的團體之複雜畫圖』，他這個用意就是想把稍爲改良的巴枯寧的觀念，去代替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觀念之一個胆小的企圖。社會主義史告訴我們，所有這樣的企圖應當終於無可幸免的破產。

我們已經不去批評鮑威爾所贊揚的什麼『社會主義的民族原則』了，在我們看來，這就是資產階級的『民族』原則，去代替階級鬥爭的社會主義原則罷了。如果民族自主是從這樣可疑的原則出發的。那末，必須承認：民族自主只能給工人運動一個害處而已。

於是乎，民族自主走向民族主義方面。

誠然，這個民族主義不是這樣透明的，因為它用社會主義的詞句巧妙的掩蓋起來，但是，正因為這樣，它對於無產階級更加有害。對於公開的民族主義時常可以應付：人們不難看見它。和掩蓋的民族自主以及戴上假面具使人不能認識的民主自主作鬥爭，那就更加困難。穿上社會主義鐵鎧的民族主義，更少受傷，而更多活動力。一經活動到工人當中，這種民族主義便製造有毒的空氣，散佈民族猜疑和民族孤立之有害思想。

但是，民族自主的害處，不限於上述各點。它不但造成民族孤立的基礎，而且造成分散統一的工人運動的基礎。民族自主的思想造成心理上的前提，以分裂統一的工黨而成爲各個局部的按民族組織起來的政黨。在政黨分裂之後，工會亦隨之而分裂，於是便成爲完全孤立的局面。統一的階級運動，如此分裂而爲各個局部的民族支流。

奧地利亞，是『民族自主』的策源地，它給了這種現象最可悲痛的例子。過去曾經是統一的奧國社會民主黨，從一八九七年起（文伯克黨大會之年）、已開始分裂而爲各個局部的政黨了。自從通過民族自主的不魯尼黨大會（一八九九年）之後，分裂更加厲害起來

了。最後，竟弄到這樣的地步：統一的國際政黨，現在成爲六個民主政黨，其中捷克社會民主黨甚至不願與德意志社會民主黨發生關係。

但是，與黨有連帶關係的，便是工會。在奧地利亞，亦如其他地方一樣，擔負主要工作的，同是社會民主派的工人。因此，令人可怕的就是，黨內的分裂主義引到工會中的分裂主義，而工會也要分裂起來。實際上也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工會也分成了各民族工會。現在往往甚至弄到這樣的地步：捷克的工人破壞德意志工人的罷工，或在市政選舉時與捷克資本家取一致行動，去反對德意志工人。

民族自主的收穫，便是這樣。

從此可知，民族自主不能解決民族問題。況且：民族自主使這個問題尖銳而紛亂，造成適宜的基礎，去破壞工人運動的統一，使工人按各民族而分離起來，加強這些工人之間的糾紛。